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23 期 2013 年 12 月 5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白花丁香树 • 于小红	2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 张文澄口述 李畅培整理	16
渣滓洞的宣传主题：求生还是赴死？ • 孙丹年	22
交出了一封信 • 牛立华	25
高野新诗作选刊	28
黄万里的女儿谈父亲 • 佚名	34
我的仲夏夜之梦 • 白桦	37
一个老右的“宪法梦” • 黄宝松	42
地下党员被摧残的一生 • 裴毅然	45
从一个电视剧演员想到的一件往事 • 木人	48
长春围城 • 龙应台	51
艾思奇和云南的两个李曰垓 • 汉生	54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 : bsyy1957@126.com

白花丁香树

于小红

【编者按】《巴山夜雨》第22期选刊了于光远老前辈的《细雨集》文选。遗憾的是，就在9月26日，尊敬的于老辞世远行了，享年98岁。本期特刊载于老的大女儿于小红的长篇散文《白花丁香树》一文，以示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学者于光远先生的深切悼念。作者在这篇长文里深情地追忆怀念两位伟大的母亲——她的妈妈和姥姥，特别是于小红的母亲——孙历生女士，于光远的前妻、战友，14岁就入党的“老革命”，也难逃五七右祸，1968年，年仅34岁，惨死在劳改的牛棚中。让我们与作者一起悼念这位早逝的难友，愿她在天堂花香永远。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蝴蝶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图片：父亲于光远的葬礼)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姓郁，他本名郁钟正，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仪式



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小党员大眼睛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解放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解放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你要嫁给爱你的人就只好由你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你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图片：我，妈妈，1953）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丁香树下梳头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父

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 60 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好日子不长久

我和妹妹的到来让小院子里充满了快乐，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来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辞去了义务扫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养了一个智障女孩。家里很挤，姥姥的床变成了个通铺，孩子们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树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饭。爸爸的《政治经济学》稿费可观，买来木马、小自行车、跷跷板，小院子就像个小托儿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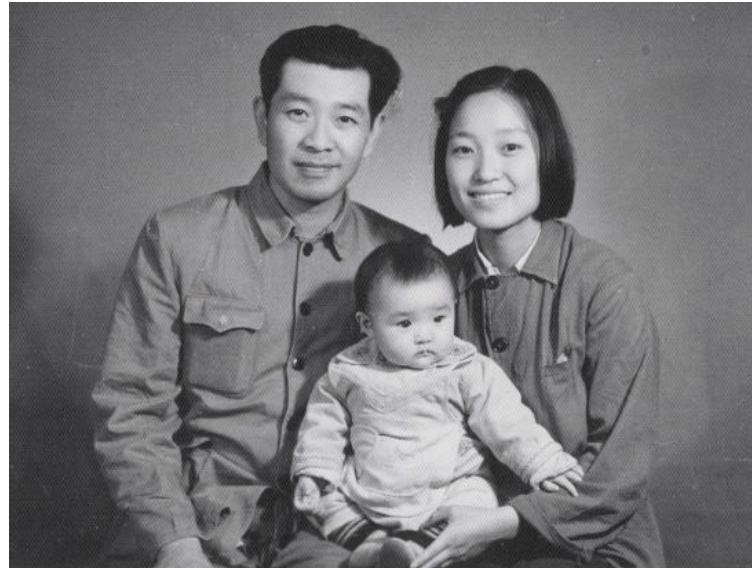
（图片：爸爸，我，妈妈，1954）

好日子不长久，23 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图片：妈妈陪爸爸去考察，1956）



蝴蝶结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滩中宣部里。和妹妹们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拥宠和被鄙视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动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时，他会来把我带走。我五岁多开始有了记

忆，片断而深刻的记忆，电影般地在脑里重复着。爸爸和他周围的许多人：秘书、司机、学生、同事。。。尽管妈妈被劳改还是宠着我，因为我长得像妈妈。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时，姥姥会把我打扮好，头上扎蝴蝶结。

有时我也会在爸爸那儿住几天，爸爸会找远房表姐放学后来陪我。但若父亲整天开会不在，偌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孤独无助。

大屋子里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的，还有瘦巴巴、饿兮兮的小老鼠。困难时期，连小老鼠们也要找东西吃。

有一次，平常来陪我的表姐没来，天黑了，房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找到了一瓶浓缩桔汁，哭一声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点儿水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才回来。

石榴树

四合院里那棵盆栽石榴树，是妈妈喜爱和挂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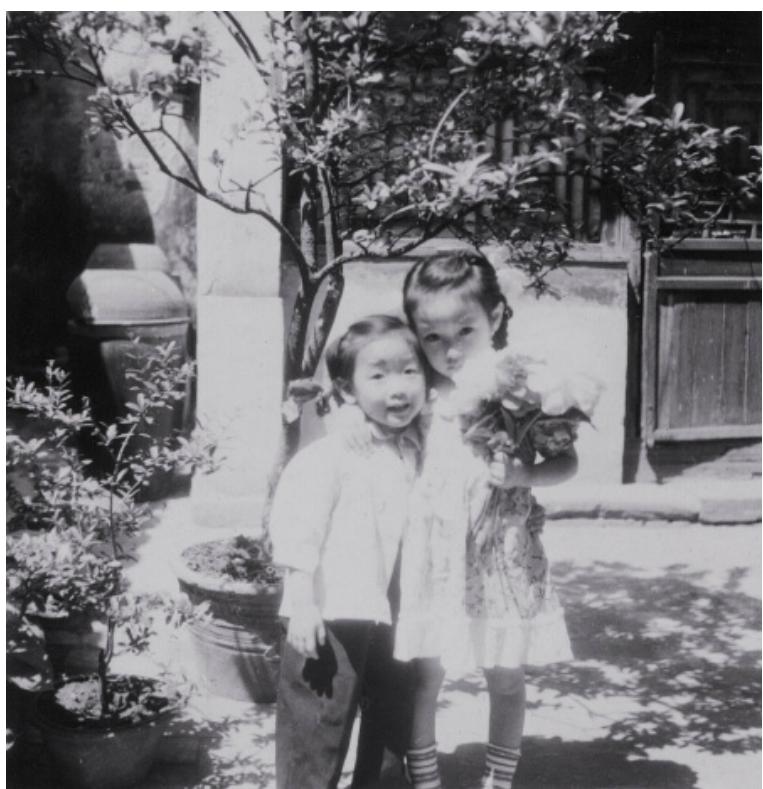
我猜：这棵石榴树是姥姥和姥爷在妈妈小时候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难怪妈妈大祸临头、前途莫卜时嘱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树前，这张相片看来是妈妈把我们装扮好了后，叫爸爸给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后，她是不是回到农场去了？

那石榴树的影子，就是妈妈的影子。



(图片：我五岁生日，1958)



(图片：小康，我，约 1960)

无奈离婚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在档案中消失，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大妹妹小康和我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鸡和吓人。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天堂河

（图片：劳改农场，妈：
右起第4，1960）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



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姥姥赶紧拿出我们三人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我作为“小女主人”在宴会中的照片、小康淘气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让妈妈高兴起来。妈妈给我梳好头发，剥了一个鸡蛋给我，我没要，塞进了妈妈嘴里让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记得妈妈回过家。

小妹妹叫妈妈

三妹小蓓出生之后一直由姥姥抚养，已经会走路说话了，还没曾见过妈妈。

妈妈从劳改农场回来，一进门，小蓓和妈妈两人第一次眼光相对，小蓓叫了声“妈妈”，妈妈很是惊奇，小妹妹怎么认得她？妈妈随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里相片多，姥姥常把妈妈的相片给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丁香树下听故事

1960年春天景山学校成立，爸爸给我报了名，六岁的我上学



了。（图片：我，小蓓，姥姥，小康，约1961）

同学们多是大院的孩子，但是我每天要从姥姥家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有一天某老师问起我住哪，一旁教务长刘老师搭腔：“她是于光远的女儿，爸妈离了婚，妈妈是右派，她姥姥。。。”。同班同学多年后还记得我打转的泪珠，我从此不和这刘老师说话。我喜欢上学，尤其是数学，但是上学最初的几年不太爱说话，我知道我和别人不同：“右派的儿女”。

儿时大家爱听故事，每天傍晚，因为要让姥姥快点儿在丁香树下开讲，吃完饭后孩子们会积极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听姥姥编纂她的侠义故事：“十三妹”“七侠五义”等等好听的。

十三妹她们武艺高强，姥姥一定是希望我们将来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没有意义的。

二次姻缘

离婚时妈妈只有二十四岁，她单纯、善良、乐于助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身体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车拉不动，大家会帮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锹他一锹，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妈妈劳累下恢复了些笑容。1960年饥荒恶化，劳动的强度增加，这时一个同龄的小伙子进入了妈妈的生活：聂宝珣，北京三十一中历史老师，其父亲为北大历史学家，不知何故被划成了右派。聂叔叔尽自己可能帮助保护着妈妈，在劳改农场旁边的法庭里，他们结合了。

同一个法庭，一年半之前，妈妈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离了婚。

妈妈怀孕了，饥荒时期在劳改农场生孩子，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妈妈和聂叔叔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急坏了姥姥和聂老先生。聂老先生注意到儿媳的贤惠和好学，因此几乎倾家荡产的给她提供营养。聂叔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没有聂家父子，妈妈在那个年代是活不下来的。聂老先生与小孙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聂祖同，儿子儿媳劳改期间，聂老先生抚养我这个妹妹小同。妈妈怀胎，尽管有聂老先生相助，农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仍然造成初生婴儿的发育不良。产后身体虚弱，妈妈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种蘑菇。

半个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在景山学校念书，中午有时会被爸爸接去吃午饭，放学会回姥姥家。白塔寺电车站在女三中门口，我有时就会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妈妈，帮忙植放菌种。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会把爸爸口信转述给她，他们在姥姥家见过面。六一年底妈妈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许教书而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作为摘帽右派，她还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她和聂叔叔的住处离姥姥家不远，从女三中出来先要经过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聂家宝贝，聂叔叔对我们很好；聂老先生疼爱儿媳，同时善待我们三个。母亲带我们去过聂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记得他书房中厚厚大大的线装书。

妈妈在资料室工作后，放学路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妈妈，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妈妈出门永远围着一条酱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岁，小康开始上学，我每天带着她往返学校，我们一下车就会在人群中追寻酱红色头巾，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妈妈。一开始我

们能搂住她的腰，后来达到她的肩膀，最后能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妈妈的眼睛，要她猜是谁，我们一天天长大，长高了。

见面任务

作为最大的孩子头，我第一个任务：从爸爸那儿取来生活费给姥姥。

大约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结婚了。爸爸中宣部里面的家中，我们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气、不爱笑、不爱说话。后来，爸爸家的小东妹妹出世了。我带着小康上学，中午饭跑到东四买小吃，在一次受了骗之后，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饭。我们和同学一样，有时吃五分钱一份的大锅菜。两毛钱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红柿炒鸡蛋算是上好的饭，每个星期一样吃一次。每个月我和小康星期天会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对我们很客气，从来没说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爸爸那里当作我们的家。

爸爸不来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个任务：带小蓓去见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里开出了个小套间：小灶，领导们可以吃到炒菜，孩子们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来食堂，但偶尔会和几个叔叔来吃饭谈事情，那时爸爸会在大食堂找我，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带小蓓等他。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车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车来抱起小蓓亲一口。分手离开时，我们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一下我们的鼻子。他有时会从兜里掏出些糖果，有时一支笔，这种见面方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冬天有时很冷，长安街上风很大，脚指头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数着：一辆，两辆，三辆，。。。数公车过去了几辆。

我那时还不懂为什么我们见面得这么秘密。爸爸从来不会先到车站等我们，我们得等着他，他有时迟到，我们的约定是不见不散，他一定会来。不过有时等他等很久，终于他从车上跳下来，第二辆车一到就匆匆上车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见。间隔不到几分钟，如果中间放走一辆车，时间就算是长的。1966年5月，中宣部的阎王（部级干部）和判官（处级干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学去串联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经常没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见面就变得很少了。再后来我和小康都离开了家，靠好心人帮忙爸爸和小蓓的见面地点就改在长安街上的国际电报大楼。到他晚年“坐轮椅，走天下”总也忘不了约上小蓓见个面。

妈妈偷偷回家

妈妈在女三中从1966年开始就挨斗，沙坪校长死时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来回家取东西，她就会匆匆来看姥姥和我们一眼。

这一次她偷偷回来看我们，也在姥姥梳妆台上放了钱。（离婚后，妈妈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十五块钱放在姥姥梳妆台上）。

妈妈通常只穿白衬衫，没有斑斑点点的衬衫，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妈妈受折磨了。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的多。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来了小板车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们来了，她们推着小板车，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发面粉，指派接待串联的学生人数（例如每家十人）。她们用秤杆，按学生人数派发给多少斤两的白面粉，告知要给红卫兵做饭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街坊大妈派发面粉的时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儿从沈阳来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岁，穿着军装、军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带。看着同龄人走南闯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大有作为的样子，令人羡慕。表姐拉了我说“妳怎么不当红卫兵？”我弱弱地答“妈妈”，她迟疑了一下子（明白妈妈是右派）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拿了三个盆子接了面粉。看到表姐风尘仆仆的样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饭，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没了踪影。姥姥说“表姐没能在家吃饭，我们蒸一次包子给别的串联孩子们吃吧，他们太苦了。光是白菜没油不行，妳去买些肥肉吧。”胡同口的肉店五点关门，我先去买了一块肉，然后把面揉了隔夜发了。

（日后感想：如果表姐没在那关键时刻出现，我们就不会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来，第二天，正牌红卫兵或许可以阻挡乡下杂牌军，姥姥或许不会被打得那么惨。）

菜肉包子惹麻烦

第二天一早，我帮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进去，蒸了一百多个菜肉包子。中午开饭了，包子一抢而光。

听说有包子吃，更多红卫兵从别人家跑过来。因为我们包了包子，别人家吃的是馒头咸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我们是地主、资本家。吃完包子后，他们开始到处搜，最后翻出一张房契，他们说这是“变天账”。

这帮学生没穿军装，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也没有铜扣皮带好抽人，于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邻居拿了三四把铁锹、拔了玉米秆，有人开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着头尾成双棒抽人（不知他们乡下孩子是否如此对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

（现场示意图）



姥爷当时已经在工业学院被审查，家里只有姥姥、小姨、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小姨刚刚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岁的

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婴儿在南房里哭啼没人管。

看热闹的人说我的妈妈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结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妈妈押来。据妹妹小康所述，妈妈一进来就自己跪到姥姥身边，看着他们自动“坦白罪行”，他们下手就减轻了。

我们被命令罚站，家里一切被打碎之后，他们挑破了房子的顶棚，挖开房子里的方砖，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吓得紧紧攥着我的手，以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钱。自从姥爷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教给我和小康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万一发生了什么，别丢了小蓓。那救命钱是绑在我们身上的，我当时真怕他们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钱搜出来怎么逃，我想我们一定会没命。

第一次做饭

从中午打到晚上，红卫兵们累了，撤走了，妈妈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后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来床板，放在坑上，让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抢光了，我们一家从早上就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给她。红卫兵们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丢到坑里砸了。我只找到一只搪瓷碗里有点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挣扎着叫我给全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我和小康找来一个蜂窝煤炉，火点不着。撕破的书，打烂的家具比比皆是。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书和家具点起了一堆火。幸运的是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了一点米，南房后院夹道棚子里，姥姥有一坛刚刚腌的鸡蛋没被发现，我们煮了粥和鸡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们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卧床不起了。从那天起，我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每天往返于牛棚之间传递着亲人的消息：姥爷、爸爸、妈妈；去姥爷单位领生活费，煮粥、做饭。小姨父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没人带，我也得帮忙。带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车，变卖了家里打烂的东西来贴补家用，把土填回红卫兵在房子里挖的深坑。

爸爸能给姥姥的钱也只有几十块了，幸亏姥姥藏了一些钱，藏在我们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钱。

第一次缝衣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庆这时候快出世了，姥姥让我找出抄家没被拿走得一块花布说“那个孩子不管



怎么说，也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现在也遭难了，你帮着我，咱们缝个小被子，小棉袄吧。”姥姥趴着，缝不了，我的针线活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开始学的。 (图片：爸爸的书架从来

都是满满的，1993）

爸爸的稿费大多用于买书，他当时有二十几万册藏书，我们也要帮继母把书籍当废纸卖。他们必须搬家，书只能这么处理。精装书是不值钱的，要把书皮扯掉才能卖。小康跟着我卖书，我们每天得去卖至少两小车书。只要没看见，小康就躲起来，在那些书消失之前多看几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遭殃的胡同

我从早到晚忙，没有告诉姥姥我看到了些什么，也没有去关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和我说起其他人。姥姥家住老门牌26号，25号住着小梅一家。小梅爱跳舞，会用脚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说，我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姥姥让我去找老保姆打听，他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谁领走了。姥爷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号，他们被赶回了沧州老家，说是地主，老家的人说他们饿死了（没有给他们分粮）。二姥姥很胖，死的时候皮包骨。27号一墙之隔住着王蒙，王澈一家。他们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谁也不会来往了。



（图片：姥爷和姥姥，约1955）

老云南白药

妈妈又一次被放出来回家，应该是拿换洗衣服的，被允许的时间有限。看到她的白衬衫又斑斑点点，姥姥就让我找出换洗的衣服给她。

妈妈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挥着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云南白药，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给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她们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开好说悄悄话。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因为妈妈停留的时间长了些，她没能回到自己家里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学校了，姥姥叫我们到她家探视，因为她家大人只剩聂老夫人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人，你们长大必须帮助她”。姥姥经常告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学妈妈，她太容易被害了”。

粮票的牵挂

妈妈每个月都会回家拿粮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取，姥姥会很担心，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妈妈学校里的信息。

我们常用的白塔寺公车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们想进去探探消息，可是门口挂着“女三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字牌，还有红卫兵出没，徘徊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石榴花落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12/196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厉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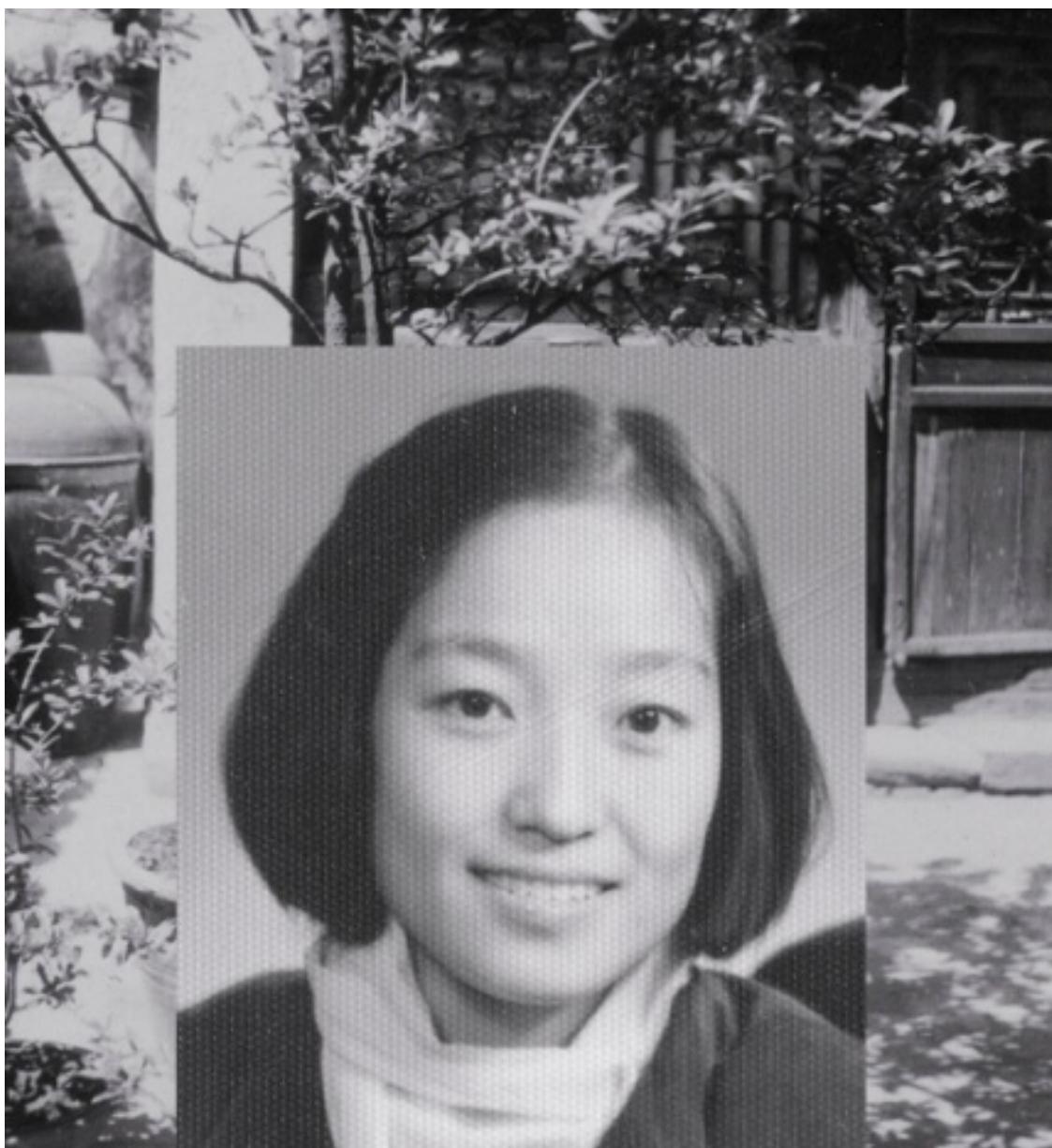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 29 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我们三人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白花丁香树

(妈妈 , 约 1954)



宁夏与陕北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 (1969) , 爸爸蹲五七干校 , 我去宁夏看他 , 帮他养猪、种旱稻。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 , 我跟他说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 , 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 , 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 , 附近农民都来观摩“科学农业”。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 20 元 , 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 30 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 , 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 , 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 , 路上走了十天。后来 , 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

妈妈的经历无疑地影响了我 , 姥姥的告诫“防人之心不可无” , 诚然不错。但是 , 防范别人费心机 , 我们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 , 例如妈妈一生没有害过人 , 至少到死也没有害人的机会

和念头。动荡期间，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妈妈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受害者。

(图片：陕北插队，我：右起第二，1971)

合影缺一人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禺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禺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

这几天清理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在西四大街照相馆拍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 1968 年九月，妈妈死后不久。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去的照相馆，他和姥姥当时说了什么。这一次他没有顾忌什么，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儿们照了相。



结语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

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张文澄口述 李畅培整理

张文澄同志在 1989 年 4 月 16 日和 22 日，分两次讲述了他（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在场的有赵隆侃和李畅培、吴艺同志。商定由吴艺负责录音，由李畅培负责文字整理。后来，因为录音没有成功，整理工作就搁下来了。时光过去，赵隆侃、张文澄同志竟先后逝世，只能根据我当时的文字记录，整理成稿了。记录稿曾送交一些知情的老同志审阅，他们对史实的准确性予以肯定。张老的家属则提供了张老生前写就而未示人的手稿《难忘的 1957 年》。此文的叙述面较口述的窄，有些地方却更为详细、深刻。所以，口述记录除据以核校外，还采取了部分内容作为补充，这部分文字用斜体字标明。想来不至於违背了张老的本意。文章的标题是整理时加的。

记录整理者 李畅培

我按事情的发展，分这样几个问题讲：第一，1956 年的三次党代会；第二，1957 年的宣传工作会议，包括市政协会议；第三，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

在这之前，先讲一件事，算作引子。

1956 年对私改造，市里进行理论学习，任白戈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定息是否算剥削？白戈答：不算。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的理论教员、组长谢予有不同看法，他给《学习》杂志写信，表示不同意任白戈的看法。《学习》杂志回信，同意他的观点。谢在讲课时就点名提出不同意见，说“市长同志”如何如何。传来传去，变成谢予说“市长先生”如何如何。反映到市监委，廖苏华就调查此事。她问我，我转问王匡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说：这事我知道，谢予对我讲过，他是讲的“市长同志”。我就据实回复廖，并说：这是理论研究发表不同看法，不是大问题；当然，也有缺点，谢予在公开场合这样讲，不恰当，但是也算不上纪律问题。廖苏华就没有查下去了。谢予对我们倒有意见了，在选直属机关党代表时，他在支部大会上就这件事讲：选张部长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态度不鲜明，我有意见。

想不到，后来这件事却成为“张文澄反党集团”的主要依据之一。

（一）1956 年的三次党代会

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须通过各级党代会层层选出。市委直属机关所属的文联支部（包括文联机关和作协），白戈想让曾克作代表。文联支部的支书李南力在下面体验生活，他不知道支部传达的白戈意见。开支部大会时，大家提了李南力的名，于是报上来的就不是曾克。辛易之（市委书记处书记）向任白戈汇报，白戈说：不行，还是得曾克。直属机关就通知曾克来开会了。在预备大会上，关于李南力的代表权问题，发生了争执。我问：文联支部选出的代表李南力为何不出席，而是非代表出席？辛易之说：这是白戈同志的意见。白戈站

起来作了解释。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选举手续的。我争辩。同时就有三个人起来争辩，有王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和另外一个姓王的。任白戈下不了台。直属机关党委来个折衷，李南力出席，曾克也出席。

到后来，这件事情也成为我的罪状了。

……财贸部长余跃泽……（此处未记下）另一个发生争执的人是邓垦（副市长、教育局局长）。宣传部小组王匡时及汪国桢（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听到一些关于邓垦缺点的反映，就不同意选邓垦作市委委员。情况汇报到主席团，任白戈要我做工作。我提出，找王匡时来白戈处一起谈谈，应该选邓垦。谈至深夜 10 点。王匡时住家在六中后面，校门关得早。我问王，回家叫门是否方便，邀他到我家住一晚。这是当着白戈的面邀请的。——以后，这个晚上的事却成了我和王匡时“密谋策划”的根据，说我与王匡时事前策划让谢予出来反党。

四川省委举行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发生了几件和我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在预备会上，我对主席团名单有意见，没有解放前在四川工作的老同志，如像程子健、张曙时。我提出：在四川开党代表大会，四川的老同志，张曙时同志，我建议选入主席团。有人附议，于是通过了。关于议程，我提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在四川工作的许多同志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大会应该增加一项议程，为四川的死难烈士默哀。有人提出，不要这样狭窄，应该为所有牺牲的烈士们默哀。这项建议又通过了。第二件事。省委书记李井泉向大会作报告，但出来作报告的却是秘书长闫秀峰。下午分组讨论，重庆代表团 50 来人，由白戈主持逐项讨论。我提意见：党的代表大会上，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也坐在主席台上，本来应该由他作报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表态，就让闫秀峰秘书长代作报告。这是井泉同志与代表大会的关系没有摆正。两天后，李唐彬（市委书记处书记）、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家栋（工交政治部长）与我至白戈住处开会。李唐彬说：打个招呼，重庆才划归四川省不久，应该注意和省委的关系。我明白这是针对我的，便说：这是开党的代表大会，每个代表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谈不上尊重不尊重省委的问题。如果不让人发言，莫非是李政委式的民主？（当时四川党内习惯于用战争年代对李井泉的称呼）刘家栋无语冷笑。萧泽宽则说：“你不能这样说。”李唐彬说：“这样说，会不好开了。”我说：“那我走了。”

第三件事，选举。我们提出票箱应先打开来看看……总监票李唐彬照这样做了。选举结果，李井泉少了十几张票。我也未投他的票。会场上的几个票箱，是分开来计票，再相加得出总数的。文革中才知道，李井泉由于未得满票，竟动用专政机关的力量查出了哪些人没有投他的票。

这样，我就是十恶不赦了。后来说我反对省委，在省党代会上兴风作浪，以地下党代言人自居，在三级党代会上兴风作浪……都是从这里找到“罪证”的。

（二）1957 年的宣传工作会议

1957 年 3 月，党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重庆是我参加，省委是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出席。毛主席的讲话，我作了详细的笔记，会下又互相核对，准确性达到了 90% 以上。会议期间，还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这两个讲话，后来正式发表时都有重大修改。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政治标准，在讲话录音中是没有的；《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段，在讲话时是没有的。我们回去

传达和贯彻执行，都是按照记录稿。我还把记录稿打印出来，供市领导学习。1957年上半年，市委宣传部在“八大”文件和毛主席的两个讲话的鼓舞下积极工作，组织学习，到处宣讲，气氛十分活跃。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最后要求：回去之后，各级党委都要由第一书记主持召开同样的会。

四川省由李井泉出面开了宣传工作会。回来后，市里白戈却按兵不动。他住医院了。这时，重庆各界在整风运动号召下，热情很高。宣传部研究，新闻界、文艺界都在等着传达。我们建议，由白戈同志来主持。于是，由王若、陶端予两位副部长，带领《重庆日报》副总编贾唯英和新华社记者廖永祥等，去向任白戈汇报，白戈却说：“我不是第一书记。”（廖永祥写了一篇内参稿《第一书记是谁？》，后未发表。）原来，1955年上半年，曹荻秋调走后，李井泉来重庆宣布：曹走后，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排是，鲁大东、任白戈、李唐彬、辛易之。任白戈不高兴，以前的顺序是任、李、鲁、辛。不久，毛主席来四川，拟在三峡游泳。罗瑞卿带水手试了试，不行。劝阻了毛主席。罗瑞卿来重庆时，白戈同他谈了自己的意见。罗向中央反映了。半年后，省委下文，重庆市委书记由闫红彦兼，书记处书记的顺序是任、李、鲁、辛。但闫红彦常住成都，实际由任主持工作。白戈这才出面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不开集中的宣传工作会议，而开政协会议，各口（文化、新闻等）分别召开座谈会。

直到市里召开政协会议前，我们才知道中央的意图。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和后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应当批判》相同，电报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等洪峰过去，我们再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我们这才知道，中央是“引蛇出洞”的策略。

（赵隆侃：电文中似有，应见报以立此存照。除物价、反苏等几个问题外，其余的都可见报。）

市里召开的这个政协会，白戈是作为代替宣传工作会议的，单独成立了党组，由我、肖泽宽、杨松青组成，我任书记，杨副之。毛主席的绝密电报，只有少数领导人才知道。我对毛主席的策略深信不疑，照着电报精神行事。在政协会议之前，召开了与会的党员会议，鲁大东出席讲话，他讲的既不符合鸣放整风的精神，也不够“引蛇出洞”的策略。我就补充几句，主要是贯彻主席的电报精神，要放右派出笼。（后来，这也成为我的罪状——书记讲话后我又补充。）冯克熙发言，讲知识分子，讲得不错，连李唐彬、萧泽宽都鼓了掌。发言的人中也有发牢骚的。后来，开会研究反击。我不主张反击，因为中央是要“引蛇出洞”。遂让同志出来发言摆明事实；我也发言，除表示引导鸣放——“引蛇出洞”外，对某些左的作法提出批评。后来批判我的时候，说我的发言（全文见报）是纠合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宣言书，说我是“统帅”，还说我向任书记“逼宫”。

文艺界、新闻界的座谈会是分别开的。我们的态度是，“硬着头皮听”，也作分析，区别对待。任白戈也讲了话。为了“引蛇出洞”，有些话他讲了，我也讲了，比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类。

在5月份的活动中，我除了“引蛇出洞”外，也还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朋友们帮助党整风。

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后，我就一心投入反右派斗争，执行反击右派的任务了。我除掌握宣传文化系统的反右斗争外，还进驻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打了不少“右派”，而且，我在思想上都认为他们是右派。这些人在看见我也被划为右派后，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怨恨，但我至今仍为自己盲目崇拜毛主席而办的错事，深感遗憾。

（三）市委第八次扩大会

这次会议开了两个星期。第一周，动员鸣放。我是市委常委，是被批评的对象；而且我已经知道了中央的意图，但是并不知道会搞到自己头上。我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一次言也没有发。卢光特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给萧部长进一言》，一张是《书记与麻雀》（希望任书记加强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后来卢光特被打成右派，并非只因为这个，而是他在 1956 年节约检查会上讲过机关坐车和分房的问题，得罪了李唐彬。后来听说李唐彬指名把卢光特打为右派。鸣放到最后一天，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张文澄同志》，是邓垦写的，讲 1957 年《重庆日报》问题，（时小平同志在渝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批评《重庆日报》不像党报的样子。该报副主编贾唯英后被打成右派。）大字报质问我（宣传部长）应负何责。就从这张大字报开始，市委就把会议转入第二阶段，重点批评被指定为有错误的人。此后市委扩大会议提意见，把 1956 年三次党代会，特别是省党代会问题提出来了。实由几个书记分别讲出来。会后，令我停职检查，而其他小组很快转到批张，文字材料也发至小组，几位书记分别到小组说明材料，动员批张。我看了这个材料，无非是把我在政协会议上和在各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断章取义，加以指责罢了。我原是宣传部小组长，副组长为王若。市委这时指定了邓垦从教育局到宣传口作小组长，指导运动。这时，我还是市委常委，没有免职，有关的记录还给我看，所以我不仅知道宣传口小组的情况，还知道其它各组的情况。各组给我提的意见，大都是骄傲之类，宣传组有的同志一言不发。龙实是文联党组书记，郗永吉是高干班的，他们搞了个联合发言，根据市委印发的材料提出了十个疑问，如“李政委式的民主”算不算反党？王匡时作了言不由衷的发言，从理论上讲了些“不清楚”、“不明确”等。宣传部小组会开了几天，没有开出啥明堂。第二周就分别转到各口的对象上去了，共有我、张显仪（市总工会主席）、陈筹（副市长）、安以文、丛戎、吴奇、老刘文泉等人；前三人为重点。打击面广，局以上干部在十人以上。八次扩大的结论发表了个公报，登在 11 月下旬的《重庆日报》上，但都没有戴“右派”、“反党”的帽子。公报说，会议集中批判了“修正主义、工团主义、分散主义”，但没有点名。虽然明眼人不难看出，“修正主义”指的是我，“工团主义”指的是张显仪，“分散主义”指的是陈筹，但毕竟没有点名。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的时候，还以我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8 日，我接待日本朋友，他们说看到了我的文章。

（赵隆侃：当时见报，是这样一个公式，还称同志，说“某某当他和党站在一起时，做了一些工作……”）

八次扩大的报告后，市委给省委一个报告。听说李井泉不同意这个报告，指派廖志高来重庆，督促划张文澄为右派。

文革中间，李止舟听邓垦讲：市委第八次扩大的前，李井泉到重庆来，召集市委书记、市监委书记加邓垦 6 个人开了小会。邓垦当时只是副市长兼二办主任，而且不是市委常委，只

是 1956 年选的市委委员，要他参加会议，就很不寻常，不是正常的组织生活的表现。这个小会提出，重庆以张文澄、萧泽宽为重点。为什么提张文澄？据熊扬讲，李井泉说：四川党内右派分子的进攻，不是从 57 年开始的，而是从 56 年就开始了，从 56 年省党代会就开始了，重庆的张文澄反党集团就是。

文革中间，贾光后有一个材料见于小报，其中有一段话是符合的，即李井泉未得全票，查的结果，在重庆打了个反党集团。

又为什么提出萧泽宽呢？萧是 56 年市节约检查小组的副组长，他提出来：小车、房子，不要一人一辆，一人一幢，可以合用。（赵隆侃：他还提出，租金应该严些。）李唐彬发了脾气，他不同意。

在那个小会上，李井泉问：把这两个人都拿出来如何？辛易之建议：打张留萧，比较有利。李井泉甚为同意。

邓垦对李止舟讲这话，是说明打萧之意是早已有之的。

后来作准备工作，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是知道的。把准备好的张文澄的材料报省，要李井泉批了才能抛出来，是由徐雄连夜送去的，等着李井泉批阅，见李有所批画。送回时，在市委第四会议室，仍是市委书记加邓垦。见了李井泉的批文，邓垦才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李止舟讲的这些情况，我后来写申诉材料都引用了，从文革中间写的材料起就都引用了。从无人说不实。

廖志高一来重庆，宣传部的情况就变了，大字报铺天盖地，上升为“右派”、“右派反党集团”，涉及谢予、卢光特、郗永吉、恭平、徐和以及一大批理论教员，共计 20 来人，为宣传部的 1/4 强。

经过反复批斗，到 1958 年 1 月，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专门听取张文澄、张显仪、陈筹三人检讨，并分别对我们三人作出开除党籍的决议。在这之前，李唐彬代表市委找我们谈话，大意是，开除之后只要改造得好，今后还可以回到党内。

关于承认右派问题，我进行过长期思想斗争。如果说我在三次党代会上的言行，我认为那是党内应有的民主，不是反党；宣传部内的工作更不是右倾、右派；至于政协会及以后的一些发言，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电报指示——“引蛇出洞”，当然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为什么要划我为右派呢？我从市委发的材料上知道，是得罪了李井泉，才难过这一关。如果不承认，则“抗拒从严”，而我身后有病妻、幼儿女、老母，如我受严厉处理，他们将何以安身？思想斗争之后，我违心地承认了右派，并违心地痛哭流涕地在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免强过关的检讨。我之所以痛哭，是感到冤屈，是想到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冤屈至死的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我爱党，却被党开除，怎不伤心呢？

开除我的日期，是 1958 年 1 月 18 日下午。同时被开除的有张显仪和陈筹。（按当时的党章，党委成员，必须经过代表大会才能开除。）开除当天，宣传部秘书周宗贤奉命到我家，将我的勃朗宁小手枪和猎枪连同两枪的子弹全部收缴。这是怕我自杀和行凶。其实，他们那里知道，我能屈辱而生，是经过自杀思考又加以否定的，不会干出那种傻事来。

任白戈讲，还要清除余毒。对我的处分决议，1958 年 3 月下旬发表于《重庆日报》、《四

川日报》，并配合发了社论，占了整整一版，第二版是有关此问题的新闻报道。罪名是“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决议中提名的有王匡时、谢予，消息中还点了别人的名。又发处分决议，又发社论，这在全国似乎仅见。

（赵隆侃：报上发专栏点名批判的有海南的冯白驹、安徽的李世农、河南的潘复生，在先还有浙江的沙文汉。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了八个省，讲到像四川就有右派活动。可能各省报纸都有决议、社论，而新华社则只发了消息。毛主席讲，党内右派夸得越多，我越高兴。）

处分决议和社论，为什么选在成都会议期间见报呢？估计是李井泉安排，有意让毛主席看見。

不久，宣传口，新闻、文联的“右派”都集中在南岸区罗家坝劳动。毛主席来重庆的那个星期天，没有让我们回家。后来听说，田家英随毛主席来重庆了。抗战初在成都，田家英同我相识，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重庆就来看了林珈（我爱人），他透露，毛主席讲，只要是表现好的，两年后要开次右派代表会议。

（赵隆侃：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仲新讲，党内右派可重新入党。陶铸办右派学习班，也讲过这话。）

张显仪划右派，李唐彬找他谈话时说：你好好争取，以后可以重新入党。

我们对毛主席是绝对信任的，凡他决定的，我们都无意见。反击右派后，我还为《重庆日报》写过两篇社论，谈反右的必要性，并不认为是左。以后我抱的希望是，如何得以缓解。

1958年5月，市委叫我到砖瓦厂工作，不知什么原因，通知我到工业部拿介绍信，到九龙坡区委工业部去报到，是按党内组织系统介绍关系的。我被分配到第一机制砖瓦厂当副厂长，工资从9级降为13级。

1960年，廖苏华（时任常委、副市长）找我谈话，说：王匡时改造好了，已经回来了。你这次没有解决问题，希望你老老实实，好好改造。

1961年9月，我所在的瓷厂总支开会，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次日见了报，党内的有我和张显仪，党外的有潘大逵、鲜特生。我摘帽以后，工作未变，仍在瓷厂任副厂长。

（赵隆侃：当时的处分分几等，第一等是开除工职劳教，第二等是保留工职劳教，第三等是监督劳动，第四等是降职降薪，第五等是免于行政处分，但仍戴右派帽子。只有这个是下了国务院文件的。划的标准是“罪恶加态度”，自报等级，对号入座。）

我是戴了右派帽子当副厂长的。厂总支书记等干部确实把我当副厂长看，并且让我发挥长处，作形势报告。后来九龙坡区委书记来看见了，他走以后，从此不再让我作形势报告了。

到了1963年上半年，“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打出来了。廖苏华找我谈话，她要我安心在厂里工作，莫想调回市里。她说，李止舟都下放劳动了，到二砖瓦厂当副厂长去了。

（赵隆侃：文革中揭任白戈的大字报说任讲，张文澄、陈孟汀的工作分配不大恰当，其实可以分到图书馆、博物馆去。）

陈孟汀、王匡时都因未像王若一样积极表态，所以成了右派。陶端予在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后住院，大病了一场。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未划右派，但吓得掉了一层皮。她和刘家栋都

下放到綦江。

市委宣传部在传达、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方针、政策中很积极，但是划不划右派并不是以此为标准的；而是以“罪恶加态度”为标准。宣传口 81 个干部，划了 21 个“右派”，其中包括三个正副部长。

渣滓洞的宣传主题：求生还是赴死？

——纪念渣滓洞狱中斗争领导者胡春浦

孙丹年

熟悉白公馆渣滓洞故事的人们也许不知道，在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描绘的渣滓洞狱中斗争，其中脍炙人口的绝食斗争和狱中追悼会，其真正的幕后领导者是胡春浦。胡春浦忠实而高明地执行了中共国统区工作“隐蔽斗争”策略，以最小的代价或零代价，赢得狱中斗争的胜利。1949 年 5 月，在狱中没有暴露身份的胡春浦，经营救出狱。

人们也许没有想过，被囚禁的人，他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是珍惜生命、减轻痛苦、争取早日恢复自由，还是尽力表现英雄主义、无畏对抗、以己之弱硬拼特务看守之强？

应该说，“求生”与“赴死”，二者相辅相存，都是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长期以来“一边倒”地高调宣扬“赴死”主题，绝对威权，不容质疑、更不容辩驳。从来都是“一边倒”地英勇无畏、可歌可泣、壮烈牺牲，而很少提到牢狱中的人们也是希望活下去的，为了活下去，也是必须讲究斗争策略并作出适当妥协的。

历史上，真实的狱中斗争，主题究竟是什么？是争取出狱、争取生活得更加人性化，还是一味地慷慨激昂、壮烈赴死？历史上牢狱中的“求生”主题，与文艺宣传的“赴死”主题，差别何在？只有将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之后，才能理解胡春浦身上蕴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胡春浦出身中共中央特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发展了国民党空军中第一位秘密党员，先后受周恩来、董必武和南方局直接领导，先后协助湖北和四川地方党的武装斗争。1949 年出狱后，为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按理说，白公馆、渣滓洞出过这样一位正面人物，应该大书特书才对。但在长期的宣传鼓动中，他面目模糊、身份存疑、是鼓吹壮烈赴死的当局和文艺家们都避讳提及的。

但是，长期以来，胡春浦似乎一直以两面角色浮现在人们眼前：新政权建立以前，知道他的人，都以为他是资本家，是国民党高官的座上客，是狱中“享受优待”的特殊囚犯，而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坚强、勇敢、成熟、干练的中共党员；新政权建立后，在关于白公馆渣滓洞长期的宣传鼓动中，他面目模糊、身份存疑，被鼓吹壮烈赴死的当局和文艺家们避讳提及。另一方面，他却又总是被幸存的难友们充满崇敬地一再提到，是一位被难友们深情怀念的狱中斗争领导者。

正因为长期以来总是高调宣扬“赴死”而忽视“求生”，所以白公馆渣滓洞中凡是争取到

脱险出狱的人，在中共建政以后，政治上都很坎坷，很难顺畅舒心。不仅少有人（或根本没有）祝贺他们逃脱了死亡保全了性命，反而总是遭到歧视，总是被反复质疑：“你为什么没有死？”

别人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就算你没有投降叛变，也一定是怯懦、卑鄙、委曲求全、贪生怕死的，不然，你为什么能够活着！

历来宣扬的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主题，都鼓动慷慨赴死，提倡壮烈牺牲，几乎不提、甚至鄙视珍惜生命和减轻牢狱生活痛苦的言行。这就是胡春浦一直不被宣传、不为人们所知的原因。

从逻辑上说，部分人壮烈赴死，应该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但是长期以来，关于壮烈赴死的故事轰轰烈烈，沸沸扬扬，气壮山河；而珍惜生命的故事却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理不直气不壮。韩子栋在白公馆长期装疯卖傻，终于乘外出之机逃走，人们赞美的也总是他在逃走事件中所表现的机智，而非从珍惜生命、追求自由的角度去加以审视。

长期高调宣传“慷慨赴死”留给我们的印象是，白公馆渣滓洞中的人群只有两个极端：一、不仅不怕死、勇于找死、还撺掇着别人一起去死的英雄的中共党员；二、整天琢磨着如何弄死别人、卑鄙怯懦、凶狠恶毒的叛徒特务。

这两个极端之外，几乎没有中间地段。

而事实上，中间地段永远是绝大多数，正如大规模疾风暴雨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中，群众是绝大多数一样。多数人显示的是正常思维，正常生活，正常习惯，表现着常情常态。

正常人有仇有恨，也有恩有爱，他们追求崇高，忠于信念，更珍惜生命。正常人被捕坐牢以后，他最渴望的是早日重获自由；他的家庭，他的组织和战友，亲属同学朋友，全都急着将他从狱中捞出来，焦虑如热锅蚂蚁，千方百计往狱中送去食物衣物药品；多少家庭变卖尽净，倾家荡产，给各级牢头送去金条财物，只求被捕者免除一死，只求减轻他牢狱生活的痛苦。

即使是叛徒特务，也非铁板一块地一味穷凶极恶，整天只想着如何整死别人。他们也经常处于摇摆之中。当正义一方实力强大时，他们便靠拢正义；当邪恶势力强大时，他们被邪恶利用，但也随时可能倒向反面。从人性的角度，很难用一条横线将活生生的人们划为“非此即彼”。

永恒的事实本来是：被囚禁者努力争取的绝不是争相赴死，而是好好地活下去，争取早日恢复自由。这才是对于白公馆渣滓洞的常情视角。也只有从常情出发并以回归常识为目的，考察胡春浦在白公馆渣滓洞发挥的积极作用，才能认识到位。

胡春浦在狱中的英勇机智都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而人道主义应该居于英雄主义及其他主义之上。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胡春浦以“资本家”的派头，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上层关系，承担责任，掩护同案难友；为了改善难友们的生存状况，经常自己出钱给难友们添加荤菜。后来转押渣滓洞看守所，他利用住在不锁门的“优待室”的方便，做难友们的理想工作，安抚他们，稳定情绪，帮助他们渡过初入狱的心理难关，振奋士气；也做看守们的思想工作，争取让他们给难友“开绿灯”。他领导大伙为改善伙食而“罢饭”（即文艺作品中所称的“绝食斗争”），“罢饭”的整个过程勇敢、隐蔽、机巧，不仅斗争胜利，伙食得到改良，还达到了使全牢难友团结

同心、一致斗争的主要目的；他领导大家在重审案子时“滚案”（即滚掉、赖掉对其所涉案情的指控），以达到拖延时日、争取转机、获得释放的目的；龙光章病逝后，胡春浦秘密组织“狱中追悼会”，以他的睿智迫使看守所长亲自致祭，还做到了不露声色，不受损失。

最应该称道的（却正是小说、歌剧、影片中从来不提的）——胡春浦利用当时政府“建设文明监狱”的口号，向看守所提出“改造内部环境”的要求。

这里顺便提到，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向中国政府要求“治外法权”，即洋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治外法权”之提出，其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国监狱内部管理野蛮落后”，洋人不能受此“土罪”。因此，自清朝末年起，为了向列强争取废除“治外法权”，中国政府——无论清末朝廷、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还是各地军阀政府——在实施新政过程中，都努力争取改良监狱，提倡“建设文明监狱”。这可以与清代及以前的监狱制度作比较，例如一直保存到1990年代的重庆巴县衙门监狱旧址就是一则实例，巴县衙门监狱潮湿肮脏阴暗，还不如川中某些农民的猪圈。牢房中没有床，人犯直接睡在泥地上，给点稻草，有时给一块木板。渣滓洞即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是根据1946年新订的《看守所组织条例》设立的，其“建设文明监狱”的措施之一，便是写在院墙上的“感化标语”。牢房中，摆放着上下铺木板床。

利用了“文明监狱”口号，胡春浦想办法促使看守所同意，让难友们建立起图书室、小卖部、互助社，还组织篮球比赛等等，狱中生活状况大为改善。狱方还同意由胡春浦个人出资，给难友们订阅报纸。

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后，眼看全中国解放在即，为避免失败者疯狂屠杀导致全体殉难，胡春浦和仲秋元等写下了渣滓洞全体政治犯名单，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被捕时间、案情等内容，缝在布包里交医官刘石人带出狱外，拟托人送至香港，交《大公报》公开登载，以利于全社会展开营救。此真为惊天一笔！

可惜，该名单在邮寄时被特务查获，寄望于《大公报》进行营救遂成泡影。1949年5月胡春浦经营救出狱后，专门查问过该名单下落，得知《大公报》未能获悉该名单，不免顿足长叹！否则，渣滓洞难友们的性命，还可救下许多。

正因宣传主题的差别，所以，在鼓吹“慷慨赴死”的作品中，无论小说《红岩》，歌剧《江姐》，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都没有出现珍惜生命、关爱难友、改善狱中环境、减轻大家痛苦的胡春浦影子，他一直处于读者和观众的注视之外。但是，很多白公馆渣滓洞的幸存者都记得胡春浦，许多人，如刘德彬、田一平、唐宏仁、仲秋元、葛雅波、张大昌、傅伯雍、熊鸿嘉……等，都满怀深情地回忆他，讲述他为大家减轻牢狱痛苦、争取生存几率的生动故事。

只提倡、甚至只允许为了党国利益慷慨赴死，而不提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不提、甚至不能允许人们争取生存、争取自由，这是反人性、反人道的。今天我们纪念胡春浦，同时期望渣滓洞狱中斗争的主题得到回归以及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历史故事得以改写。

纪念革命老前辈胡春浦，以此唤醒人道，回归常识，珍惜生命，减轻痛苦。

2013,6,23.

交出了一封信

牛立华

在小监里写了一式三份《自述》，幸好没被发觉。

1969年5月从小监里放出来以后被编在严管组，集体劳动。出工排队点名，收工点名排队，在工地上有狱卒监督，一日几次清查人数，出工、收工的路上有狱警押解，干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以后，被关在舍房里不能外出，没有单独活动的机会。

劳改犯人每月最多可以交一封信。均须经过分队干部严格检查，不准超过三百字，不准透露监狱内任何信息，不准说监狱里吃不饱，不准说监狱里捆绑吊打，不准谈案情，甚至不准向家属如实相告被判了多少年徒刑。

那时中国所有的劳改队无论是座落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还是座落在荒凉冷僻的山区，对外均以信箱相称。比如，成都的消防机械厂是成都市216信箱，成都动力机械厂是217信箱，芦山县的苗溪茶场是雅安631信箱。外地寄往苗溪茶场的包裹、信函均只送达到场部，各中队每月到场部收取一次，经过狱警拆开并严格检查后发放给犯人。一般只准寄衣物，不准寄食物。假如个别犯人的亲属或朋友寄来罐头，必须打开，狱卒用勺子伸进去搅拌，确认无异物，才允许领取；寄来的药物也要打开瓶子，把药片或药粉倒在桌子上，拨来拨去，看是否有所夹带才下发。还时常发生家属寄来包裹却没有收到的现象，明知有鬼也不敢多问，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犯人交寄的信件送到分队长那里后，可能需十天半月凑够一定数量，或分队长到场部办事才顺便丢到邮筒里，等芦山县邮局的邮递员取走大约就二十来天了，劳改队没有一个公开开放的信筒或邮箱，个人绝无交信的可能。要想把写好的《自述》寄出去真是难上加难。

我需要想办法把信交出去，让家里的父母知道他们的孩子没有犯罪，知道反右和文革的真实情况，知道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判处重刑的罪名是“莫须有”，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要想私自交信，必须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当时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找其他有单独劳动机会的犯人或就业人员呢，也办不到，谁也不愿意为一个交情不深的人承担风险。刑满释放留场就业的人员星期日休息时经干警批准可以到芦山县城，县城有邮政局可以交信，但是我认识的就业人员极少，辗转托人又担心暴露，而且我才被关了九个月的小监，再加上被批斗的时候曾高声喊出“我不能向犯人低头”，由此而扬名各个中队，提起我的名字来令人谈虎色变，更没有人敢于为我交信了，看来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焦急而又耐心地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外出背粮。

十三队犯人的口粮由国家粮站供应，每人每月36斤玉米，将近400人的口粮有14000多斤，劳改队是舍不得用汽车的，需要派人到粮站背回来。

粮站在芦山县思延乡，是河谷平坝地区，距离十三队十二公里左右，山路约七公里，平路约五公里。去的时候背着背架子从十三队出发，先走一段上坡路，翻越高家山，沿着山间的崎岖小路下山，山下就是宝兴河，穿过河上长约一百米的铁索桥，再走四公里就是思延粮站。背架子是中国西南山区民众常用的背负工具，据说已有两千年历史，用硬质木料制造，由弯弓、撑架、拄拐等组成。比北方常用的背篼适应性强，可以背一丈多长的物件也可以背割下来的乱草，可以背石头也可以背砖瓦，可以背活猪也可以背人。背篼的重心在人体之外，有一个扭矩，

背起来费力，背架子的重心可以调整到人体中部垂线上，扭矩为零，背起来显得省力，用拄拐支在下面随时可以歇肩，尤其适应陡峭的山路。

每次背粮派一百二十人，每人要背负 120 斤左右，往返一共二十四公里，早晨七点多钟出发，下午五点多钟才能回来。回来的时候上坡路居多，又是负重行走，没有一个人不累得气喘吁吁，即使冬天也是汗流浃背，体力弱一点的难于承担这样艰苦的劳动，每逢背粮，多数犯人都有畏难情绪，狱警只好点名硬派。我身体比较瘦弱，又戴着眼镜，看起来显得斯文，一般来说是不会派我背粮的。他不是心疼我，一是怕我乘机逃跑，二是怕我背不动，万一过铁索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掉到河里，人死了是小事一桩，损失了一百多斤玉米可不得了，那是国家财产呀。

1969 年 7 月，正是暑热之际，要去粮站背粮，早上七点集合，凑了一百零几个人，还差十来个，狱卒徐绍华的眼神在犯人队列里扫来扫去，寻找着可以派遣的人员，这时我大声说：“报告徐干事，我去”，他看了我两眼，一挥手，让我站到运粮队列。我之所以明明知道这是又苦又累的差事还要主动报名，就是想出去走走，看看监狱外面的世界，进劳改队快三年了，一次都没有出去过，太郁闷了，当然更想找个机会出去看看有没有交信的可能。

人数凑齐了，列队到工具室和库房保管室，准备好背架子和麻袋。带队的狱卒是徐绍华和高松，另外派了四名武警持枪押运，大队人马立即出发，直奔思延粮站。

去的时候很轻松，背上只有一个空背架子，不过五六斤重，外面的空气似乎也比劳改队的空气新鲜，虽说是翻山越岭却一点也不累。

高家山林木茂密，山顶上小杉树、小柏树错落成林，据说原来有许多大树，1958 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全砍光了，现在只能看到胳膊粗的小树林。山腰间散落着一些耕地，坡地里的玉米已经有一人多高，间或看到一两个农民在地里劳作，都离我们的队伍很远，他们对过路的劳改队已经见惯不惊了。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农家住户掩映在箭竹和慈竹丛中，旁边是几块菜地。这里的农民很少下山，大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高家山位于峡谷边缘，翻过高家山就是铜头峡，1966 年苗溪茶场的犯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装机容量 1000 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供给监狱的电力。（1993 年在铜头峡动工修建了一座装机容量 8 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属四川省电力局管辖，已投入运行）。

下了高家山就能看见宝兴河以及横在峡谷两岸的铁索桥了，我一直在大城市生活，从来没有走过铁索桥，心里有点发怵，先看看别人怎么过吧，只见当地的老乡无论老少、无论性别、踏铁索桥如履平地，出来背粮的犯人虽然有些不适应，但绝大多数都走过多次，也都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这给我增加了一点胆量，别人能过我就能过。

我大胆地走上铁索桥，才走了二十米就感到桥身的晃动，心里不免着慌，低头一看，三四十米深的河谷中激流汹涌，桥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空档不断，一失足就会坠入深渊，两腿不禁发颤，我慢慢地靠边，用一只手扶着铁索，犹如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真后悔报名背粮。这时候后面有经验的难友大声提醒我：“不要靠边，走中间”，“抬起头来，不要看河水，看对面”。我回到了铁索桥的中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后面不断地有人上桥走动，铁索越加晃得厉害，我在众人的鼓励和保护下终于提心吊胆地到达了对岸。难友们对我说：“第一回都这样，破了胆就好了”，还说“走边上更危险，上下两根铁链子之间的距离很大，没有防护网，心里一发慌，身子一歪，很容易掉下去，走中间即使摔倒了，身子也在桥上，爬起来就是了”。这话很有道理。

过了铁索桥，地势豁然开朗，思延乡一马平川，全乡面积 24 平方公里，约占全县面积的

2%，人口竟占全县的10%，是芦山县著名的产粮区，盛产水稻、莲藕、生猪，我们沿着平坦的土路加速前行，大约一个小时到了粮站。

粮站当天不对外办公，宽敞的院子里都是劳改队来的人，四个武警持枪站在院子的四角，狱卒徐绍华守着过秤，几个犯人忙着撮玉米、装麻袋。狱卒高松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既可以当拐杖用又可以当武器用，他是比较爱打人的，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东张西望，监视着一百多个背粮的犯人。粮食装好了，每人一袋安放在背架子上，一声令下“出发”，犯人们把载有一麻袋玉米的背架子背上肩，鱼贯而行，点名报数，陆陆续续地走出了粮站。

一个多小时以后到了铁索桥跟前，这里叫铜头场，背粮的人在这里放下背架子短暂休息，恢复一下体力，等会儿过了铁索桥就要一路上坡了。铜头场只是长不过二十米，宽约二米的一条乡间街道，街道东侧有四个店铺，一个卖油盐酱醋，一个卖文具纸张，一个卖糖果纸烟，一个卖毛巾鞋袜等杂货。西侧是一个建有围墙的小学校，来往行人很少。再往北有几户农家小院，距离这里已经是百米开外了。

让我眼睛一亮的是文具店的门柱上挂着一个绿色的邮箱，真有点喜出望外，下次背粮我还要来，就在这里交信。我仔细看了看周围的地形，从思延乡到铜头场的大路（大约三米宽的土路）是东西走向的，铜头场在大路的左侧，南北走向，街道两侧都有房屋，在大路上不拐弯看不见街上的人物和动静，只要躲过了狱卒的视线，交封信不成问题。

铜头场地域狭小，容纳不了一百多人，后面的人相继地来，前面到的陆续起身，到了铁索桥我不敢往上走，这时候难友伍大云[1]说：“你在这儿等着，我背过去，回来帮你背”，我闪在一边看着他们过桥。伍大云几分钟就走过去了，把他的背架子放在对岸，跑回来帮我背粮过桥，我空手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地走过了晃晃悠悠的铁索桥，心里对伍大云十分感激。

到了河对岸，我接过自己的背架子开始负重上山，一百多人的背粮队伍，年龄大小不一，体力强弱有别，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前前后后拉开了大约五六百米的距离。两名狱卒和四个持枪武警走在队伍的后半部，出来背粮的大多数都是关押了很久的犯人，从来没有发生过背粮途中逃跑的事，他们的监视略有放松。真正想越狱逃跑的人也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前后都有人，相隔不过三五米，况且只有独路一条，谁脱离了队伍马上就会被发现。

我在队伍的中间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每走二三百米打着拄拐休息一两分钟。平时在队里劳动也要背运，天旱时背水上山，追肥时背粪下地，盖房子时背砖瓦石灰，收获时背玉米、背油菜、背麦子、背红苕等等，山区的运输基本是靠人力背运，可以说是必须锻炼的基本功。力气大的人能够背一百五六十公斤，我的最高纪录是背三十五匹砖，大约九十五公斤。但平时背运的距离一般不超过两公里，外出背粮是负重长途跋涉十二公里，而且大部分是上坡路，有的地方还十分陡峭，每登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遇到比较高的梯坎，要登几次才能跨上去。背粮的路上，可谓筋疲力尽，汗水长流，衣服早已打湿，索性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脑门上系着一圈稻草，它的作用是让头上的汗水沿着稻草往下流，以免流在眼睛里看不清楚路。路一步一步地走，汗一滴一滴的流，早晨出来之前吃了一个玉米馍和一勺菜，中午在粮站干啃了一个玉米馍，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七月的天气暑热未尽，肩上一百多斤，脚下十多里路，直走得口干舌燥，毛焦火辣，腿酸脚软，可是山间的路上哪里找得到水喝呢？脑子里想着前面就是梅林，不料此时臆想望梅止渴竟然无济于事，嘴里仍然乾乾的，一点口水也分泌不出来，只好默默地忍受，还要背着一百多斤继续往前走。当时心里想，上辈子不知道造了多少孽这辈子要受这种折磨。

下午五点钟左右总算到了队部，交了粮食如释重负，第一件事是舀一瓢冷水饱饱地喝上几

大口，然后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回到监舍，用毛巾擦擦汗，倒在地铺上张口闭眼休息几分钟，那个累劲儿笔墨难以形容。

背粮是很苦的，但下次我还要去，发现了邮箱是这次背粮的最大收获。

回到劳改队，我已经写好的三份自述分别藏在三个地方，其中一份用塑料薄膜包好，埋在楼梯下面的泥土里，另一份藏在地铺下面的稻草里，还有一份藏在一只破胶鞋里，只要能够交出去一份就算没有白写。

估计八月中旬又要去思延粮站背粮，几天前我就把写好的自述装在信封里，掂了掂分量大约不会超重，然后封好、贴上八分钱邮票，准备着随时可以交寄。

听说明天背粮，我十分兴奋。那天我穿了一件劳改服，把信装在衣服里面专门缝制的口袋里，戴了一顶破草帽，准备好个人的背架子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到了粮站，我对难友谢显荣[2]说：“今天我准备在铜头场交封信，你给我掩护着点”。

装好粮食以后我和谢显荣争先出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几位体力比较好的难友随即跟上，第一方队只有十来个人，在我俩的带动下越走越快，大家想着走快点到铜头场可以多休息一会儿，逐渐地和后面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狱卒要照看大队人马，离我们大约有两三百米，因为地处平坝，视野开阔，走在前面的十来个人仍在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狱卒身上有枪，子弹的速度是人步行速度的几千倍，所以他们也不着急追赶，乐得我们自由自在。

到了铜头场，我把背架子放在街沿上，手里拿着草帽往小商店走去，谢显荣在路口转弯处盯着后面的来人。我走到文具店门口，回头看了看，把信取出来，用草帽遮掩在胸前，然后一个箭步跨上文具店的台阶，举手之间，把信迅速地投入邮箱，随即转身离开文具店，慢腾腾地来到了糖果店门口，犯人身上没钱，什么也买不成，只能看着糖果饱饱眼福，做出一副走来走去闲逛的样子，信交出去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踏实多了。后面的人这时候陆续来了，跟着，狱卒也到了，清点了一下人数，催着继续赶路。

这次我不能再让别人帮我背粮过铁索桥了，要自己闯一回，但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我请难友张志彬在桥头把守，暂时拦住后面的来人，等我走过桥中间再放人通行，以尽量减少桥身的晃动。我鼓起勇气背着 120 斤玉米踏上了索桥，眼睛看着前方，脚下稳步移动，过了桥中心胆子就大了，加快了步伐，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紧接着的负重上坡，路还是那么长，坡还是那么陡，天气还是那么热，背上的麻袋还是那么重，人却不像上次那么累了。投入劳改三年，在监狱里备受折磨，家里人党团员居多，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弟弟妹妹们总认为我这个做哥哥的犯了弥天大罪才被判处重刑，今天终于交出了一封信，几天之后他们收到信就会知道我离开北京到四川的十多年始终是爱国的，长期以来也是热爱共产党的，我没有犯任何罪。这是最大的收获，想到这儿力气似乎增大了。就这样一路想一路走，心情舒畅但也是汗流浃背地回到了戒备森严的劳改队。

这封信交寄成功了，家里收到以后，不敢声张也不敢申诉，两个妹妹抄写了一份，那八页密密麻麻的原件变成了七十二页厚厚的一本，至今我还保存着呢。

高野新诗作选刊

这一年，刻骨铭心的一年

这一年，正值那个多事之秋的 1957

这一年，我刚刚跨过 25 岁的生日
这年的六月八日，一声划时空的霹雳
明知故问《这是为什么？》①
一场围歼知识分子精英的战争
就在羊谋牛谋诱敌“入瓮”时开始

这一年，坐了江山的老和尚打开了无法无天的大伞②
他亲自发动，亲自坐镇，亲自出谋划计
到处煽风点火，密谋着如何“引蛇出洞”的毒计
没有一个回合，就“工农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③
我束手被俘，顿成右俘中的 55 万分之一
不杀就是宽大，双开后按“内矛”处理④

这一年，我被剥夺了自由，扼杀了青春
人生的黄金时段就此消解在悲惨的劳改队里
这一年，被迫划清界限脱离了父子关系
砸碎了园镜，未婚妻解除了婚期
冤枉憋在肚里，口鼻溢血不止
“双开”取消了医保，医疗费全由自己开支

这一年，病后未老先衰，弱不禁风雨
重新收狱，编在老残队里收垃圾
完不成任务被批斗，狱吏更变本加厉
说什末“白养活了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重提搞土改时“谁养活谁”的老问题
歪曲了事实，颠倒了黑白，真格岂有此理

这一年，不堪回首的记忆化为恶梦常附体
五十六年如一日地伴我度过这一生一世

原载《一棵花落的树》186 页
2013 年 10 月修订遥奉《巴》刊

- 【注】①《这是为什么？》为人民日报 1957、6、8 社论题目。从一封匿名信说事，反右运动从此开始。
② 这是毛在天安门上向分别 30 年的斯诺得意地说：“我 现在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③ 毛向阿尔巴尼亚介绍反右经验时说：“这是工农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军队”。
④ “一个不杀”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均为毛对右派的宽大政策。

老了,老了,再过两天温暖的气候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两天南方的气候

-----里克尔①

1957 的反右,纯粹是个无中生有
21 年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熬出了头
唯一能有作为的那段青春,早被剥夺
这一生哪有什么像样的果实可收
老了,老了,真的老了,既活着且过过
我们身后的那“两天南方的气候”

前不久,我们才卸掉身上那副烙“右”枷锁
刚刚宽松了前半生被束缚的脚和手
我们再一次意气风发,准备着去承受
蓝天白云赏赐给我们的温暖气候
请把青春还给我们,请把欠债还给我们
好让我们最后的生命果实长得丰满成熟

这个机遇,要感恩于我们的主
费尽周折把我们领进了人生的深秋
把五七老人们个个轮回成猫(耄)和蝶(耋)
祈福我们正常的活着,正常的高寿
如果“再给我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我们就集体搬家居住在天堂的大门口

这时候,谁若没有住房就不申请贷款求购
谁若是单身,也就不必再寻找奢侈的配偶
我们已经被化为猫或蝶
从今后,蝶不去再恋花,猫也无需去捕鼠
我们只需精心地把最后一个果实
长得丰满和甘甜,全部酿进人生的浓酒

我们相依为命的守候在天堂门口
把此生不堪回首的往事慢慢回首
我们幡然悔悟:我们唯一的希望在来世轮回②
只要重新托生,变驴变马还是公牛牡牛都行

只要能避开《1984》所写的极权专制
只求下辈子有个清醒的头脑和思想的自由

2013年12月为《巴》刊约稿而专题命笔③

【笺注】①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派诗人.曾任罗丹的秘书,我的专业是艺术,只为“爱屋及乌”才爱上里尔克的诗,尤爱其诗中的那种“对现实抱着大而代之的超脱态度”。

②这里和文学的魔幻主义有点“互文性”关系.只是“借别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文学元问题的探索.诗中用了莫言惯用的“生死轮回”之民间哲理,可参见莫言的获奖小说《生死疲劳》。

③.诗歌是诗和歌的总称(犹如“陶瓷”),诗无韵,歌有韵,基本如此.作者的诗是有韵的,与港台流行的“素颜韵脚诗”不谋而合,也是一种新兴新诗新流派的“三新主义”.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另类模式。

我慨叹,我自己

我慨叹,自己生不逢时
没出生在迦利陀娑的黄金时期
我生活在纷乱的荒唐时代
倍感绝望,倍觉压抑

-----泰戈尔(1861—1941)

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
但某些方面来说,又是挺有意思

-----奥威尔(Orwell)

假如我出生在以前的元朝或者清朝
虽然他们都是异族侵略名声不太好
但他们绝对不会,绝对没有必要
煽动坏人当工具造反把好人打倒
生不逢时,厄运恰恰就碰得这么巧
遇上了纷乱的荒唐时代,生死难料
错过了阳光,错过了月亮
错过了生命的黄金时期,人生颓废了
羊谋牛谋都来了,无奈当了祭坛的替罪羊羔
伟光正前,不得不伸出自己的脖子挨上一刀

这一刀,把20多个金色年华被齐茬儿砍掉
生命树上的小鸟被驱赶,一去不复返了
牢里夜长,一坐就是二十年
从嘴上没毛到嘴上长毛

说话牢与不牢是一个样
秀才遇上兵,天大的理向谁去讨要
我只好,随大流逆来顺受
把受苦受难受屈受辱当成“改造”
虽然“改正”了环境,仍然恶梦缭绕
干扰得晚年生活过得很糟糕

我请周易先生给我掐算了四个大字
命中水不抵火,“生不逢时”
应验了我引用先知先觉泰戈尔的题记
这里,我只能慨叹命运不济的自己
如果我早 100 年,出生在 1832
我命里注定是一团云做的雨
降水于苏杭福地
一生过上南方气候的温暖日子
或者晚个 100 年,出生在 2032
正逢“历史三峡”的一江春水东流去
大江的自由,大海的宽广
说不定,我也能成长为一条名贵的大鱼

2013 年 11 月 15 日新补

夹边沟五七纪念碑：挽歌三首 ——五七精神永垂不朽

【小序】这是我读到《巴山夜雨》第 22 期刊载的《夹边沟建立五七纪念碑倡议书》后,除捐献一点微不足道的资金外,并为“五七精神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献上挽歌三首,作饿死在夹边沟的难兄难弟的《安魂曲》,并响彻大西北。

夹边沟：一部中国的古拉格历史

所有的生离死别
所有的颠沛流离
都发生在这个灌满风沙的夹边沟里
三千无辜 三千饿殍
冻馁于自掘的黑暗潮湿的地窝子
曝尸于朔风号叫着的荒沙野地
瞧,墓碑左右前后方圆几十里

布满着父辈们隐忍不言的伤逝和骨屍
请光临这里的先生女士们，躬身细读深思
你从来不相识的这个悲惨透顶的 1957

五七精神永存——写在夹边沟的挽歌

这里长眠的，是一群自由的灵魂
当年，他们曾拥有花样的青春年华
他们为了民主自由，曾经意气风发
只是为了整风救党说了几句真话
有的人，被阳谋诡计所骗
有的人，被极权强势所压
打成右派，送到这里劳动改造
最高指示按内矛处理，一个不杀
三千无辜，冻馁于人吃人的悲惨
两千冤魂，曝尸于光天化日之下

2013 年 7 月读立碑倡议而作

夹边沟安魂曲

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
拒绝遗忘，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
时间的风沙，将要掩盖血的历史
不，良知和正义将指挥一切
复活的记忆，一定能摧毁法西斯统治

建立夹边沟纪念碑促进委员会
为纪念“1957”57 周年而立石

【笺注】夹边沟，是 1957 年关押右派的集中营所在地，它的恐怖感与悲惨性，与世界各个集中营大同小异，各具特色：在德国，你可能死于纳粹的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冤狱的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于灭绝种族的毒气室；在科雷马，你可能死于寒冷的冰天雪地；在夹边沟，你只能饿死在人为的饥馑里——这便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的沉默”。（埃德蒙柏克诗句）。在德国有个集中营与夹边沟集中营十分相似，那就是达豪集中营，现在也开放给旅游者参观，在它的入口处有块碑石刻着一位十七世纪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1957 年的“反右”，无疑是个大规模围歼知识精英的大“灭口”。毛泽东在事后对阿尔及利亚介绍经验时说：“这是工人、农民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

军队。”也就是枪杆子打败了笔杆子的胜利。在清理战场时，甘肃省将吃败仗的右派关押在人烟稀少的夹边沟强制劳教，进行长期的淘汰和饥饿的惩罚。毛泽东要搞它的独裁，担心生前被人夺权，身后被人鞭尸，才对知识分子下了毒手，让他们人权丧失，累死、饿死，永世不得翻身。今天重温反右浩劫惨剧，为抵制遗忘，立碑铭记，避免重蹈覆辙。

高野执笔/2013年9月于西安

黄万里的女儿谈父亲

佚名

黄万里最小的女儿黄肖路女士现住美国马里兰州，她转述了一位朋友2001年听到的流传于北京的三句话：

不听马寅初的话，中国多生了几亿人；
不听梁思成的话，中国拆了一座老北京；
不听黄万里的话，中国毁了一条母亲河！

这三个人都与清华有关系（马寅初1911年为清华津贴生——高注）。中国著名的建筑评论家、清华教授、《世界建筑》杂志前主编曾昭奋教授，也曾提到这清华的荣耀、中国之耻辱：“20世纪50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振聋发聩但却不合时宜的声音”，结果，马校长被罢官，梁主任挨批判，黄教授戴了帽，“三位老人都走了，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呵斥，罢官与戴帽，都由他们默默承受，默默带走”……本来，已经不需要我来写黄万里——著名记者戴晴写过他，著名旅美作家郑义写过他，中国旅德学者王维洛写过他……他们的笔触都饱蘸热泪：他的悲剧经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睿智远见……正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单之蔷，在该刊“走遍世界去问河”专题中说：“你在网上敲进‘黄万里’三个字，你会发现‘黄万里’三个字的含金量。清华水利系尽可以放心了，有了黄万里，清华水利系再也不会耻辱了。”

但我在读了赵诚著《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黄万里的同事、学生的文集《追寻黄万里》之后，尤其是在与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谈过之后，深切希望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2011年2月，在网上、在我的博客中，又听到一些人对黄万里刻骨咒骂“一根筋”，“迂腐僵化的老夫子”，“动物”……我更感到自己6年前写他是多么必要了！——高注）

黄肖路对我自称，她是“家里唯一没有上过大学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也很懒散”，但她最自豪自己“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最长，知道的事最多——比五个哥哥姐姐了解的多得多，每件事都知道。”“因为从1958年起，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结婚之后两年半也一直住在父母家——一共有24年了。”“有5年只有我和我妈，只有我们两人，我妈当然就要讲祖父、外公和父亲了。”

肖路很感谢戴晴，“是戴晴首先把黄万里的治河思想介绍给全中国、全世界。”她有个计划，要先跟戴晴一起写一本《黄万里诗词本事》，“把我爸的诗词中写到的人和事，都详详细细地写出来，他骂的人、夸的人我都要写。我搜集了很多老照片。”

黄肖路说，不仅要写我爸，还要写我在清华园里生活了几十年所见所知的人，写父母双方的亲戚和朋友——包括母亲丁玉隽家的亲友。黄肖路家族父辈中与中国当代重大事件有瓜葛的也确实多，黄肖路藏头露尾地漫谈，一串一串：“文革”中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我的一个舅舅与刘少奇 1929 年在奉天一块儿被捕，我外公丁惟汾给张学良打了电报，要他别杀他们，但也别放他们”；“唐山铁道学院的前身是唐山交大，号称‘东方的康奈尔’，唐山交大考上官费留学生到美国的人，都上了康奈尔。有名有成就的可多了，茅以升、林同桦、林同棪……”

黄肖路对住了很多年的清华园的人和事如数家珍：“我父亲没上过清华，但是我大伯、二伯都是清华毕业的。1953 年 1 月 11 日我们全家从唐山来到清华，我爸就去一一拜访他大哥二哥当年的校友、1921 届和 23 届的老同学，包括梁思成——可那时林徽因病重，我爸没见著，就这么错过了。”“梁思成 1921 年上清华学堂，与我大伯父黄方刚是好朋友，上完之后都去美国留学。当时张学良要建设东北，成立东北大学，梁是工学院院长，我大伯父是文学院院长。”

她有许多回忆不肯轻易对我“解密”，想留著自己亲自写。不过，她不经意间仍然随时透露出一些生动的细节：“1952 年思想教育运动，说我爸有‘崇美思想’。其实那时他和我们全家都是刚解放了的感觉，挺拥护共产党。大学生们抓着我，我叫黄肖路，又排行老六，他们就叫我‘黄小六’：‘黄小六，你说说你爸有什么思想？’我说：‘臭美思想！’——我哪儿懂‘崇美’！”

黄肖路当时小小年纪，实在不懂学水利的人怎么那么爱吵架：“我们在唐山的时候，助教来家跟我爸谈起工程上的事，都是高声大嗓地争论，一直说到出门了还不住嘴。当时我的印象是我父亲好像跟别人老唱反调。”

“当时并不知道他更有道理，”她是后来才懂了父亲在治理黄河问题上唱的“反调”，其实是“正道”。“当时他被打成‘右派’，我确实认为是他犯了错误，是毛主席说得对，是党说得对。到特别晚的时候——1980 年代，我读到了一份手抄的《花丛小语》，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个罪证，印象太深了！我这才觉得事情不对头：哟，我爸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这个！这有什么错？”

虽然当时无从判断父亲的治河方略，但是父亲当时为黄河梦萦神牵的音容笑貌，黄肖路至今历历在目。没人肯听黄万里的意见，他只能天天忧心忡忡地对妻子、女儿说个没完。“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他对我说，这样会闯祸啊，把我们中国最好的关中平原都破坏了，地上都会出好多盐碱……我不懂，他就解释说西安附近那一带平原是产棉区，修了水库，千万亩棉田就盐碱化了——他老跟我妈说，跟我说，吃饭的时候尽对我和我妈说这些事。”

黄肖路告诉笔者：1994 年父亲得坏死性胆囊炎，病危，她从美国赶回北京探望；从 1996 年起每年都回去。年已 88 岁的黄万里住院检查，发现前列腺肥大变成前列腺癌，大夫说要赶快动手术。黄万里却不肯，他那时正在为反对长江三峡修坝大声疾呼呢，说“我一个敢说实话的堂堂男子汉”，怕一动手术，失去阳刚之气。在儿女们劝说下终于还是动了手术。动了手术，黄万里依然是“堂堂男子汉”，依然有一身傲骨。

“等我 2001 年 8 月 3 日带著儿子回去，他已经住了几天院，脑子缺营养，不能进食，靠点滴……”黄万里得知清华水利系定在这一年 8 月 20 日他九十大寿生日时举行庆贺会，非常期待。8 月初时，老问：“还有几天哪？还有那么多天哪，我不行了。”他鼓起最后的生命活力，

希望能够出席。黄肖路回忆说：“他前列腺癌转成骨癌，又转到别的内脏……他常常处在昏睡状态。他想在会上见见大家，提出改在 18 日开吧，他提出个‘浮动生日’的理由：‘我母亲是立秋之后第 11 天生的我’，每年立秋的日子不一样嘛，那年立秋后的第 11 天就是 8 月 18 日。但他的户口本上写的是 20 日，20 日是星期天，总不能改在大家上班的日子开祝寿会啊，没法提前开。不过家人怕他坚持不到 20 日，那几天我们都给他买了寿衣了，18 日就在家里提前为他庆寿，那天白天他还起来坐在轮椅上照了相，到晚上就连轮椅都不能坐了，只能躺著……”8 月 19 日，他开始发高烧，但仍然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

在清华水利系一个老式大教室举行的中国最优秀的水利学家黄万里祝寿会，有 100 多人出席，寿星本人终于还是来不了了，来的都是他的老同事、亲朋好友和学生，其中还有比他年长九岁，已经 99 岁的施嘉炀教授。与会者中并没有头衔显赫的来宾，然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却来了一位政府使者参加祝寿会，表达另一个国家对他的敬意。

祝寿会上许多人都讲了话，赢得最长久掌声的，是他的长子、黄肖路的大哥黄观鸿致词中说的“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一个星期以后，2001 年 8 月 27 日，黄万里与世长辞。“父亲去世时没有感到太大的痛苦，他没有说哪儿疼，只是呼吸很困难……”

1997 年黄万里夫妇钻石婚（结婚 60 年）合影。黄万里在照片旁亲笔题诗一首：“情坚钻石婚留影，各出名门天赐姻。四世同堂四博士，赤心报国济苍生。”（黄肖路提供）

黄肖路的丈夫章贤杰先后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现在一个科研中心研究耐高压、耐辐射、高强度的材料。他们的儿子生在中国，女儿生在美国，儿子在黄万里拿博士的伊利诺大学学政治科学，现在从事人事管理；女儿在麻省理工学院拿物理和化学的双学位，现在（2005 年——高注）正在申请医学院。黄肖路来美国后学过电脑课程，又创办过托儿所。但现在她最大的心愿是让人们了解自己景仰的父亲——“我不觉得光是缅怀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通过介绍我父亲，为我们民族提供教训，将来走上正确的道路。”

她说：我给儿子和女儿讲过很多次父亲。我女儿 2002 年进大学，看了一些翻成英文的介绍她爷爷的材料；我儿子也知道一些他的事迹。得知克林顿给黄万里回信，儿子很奇怪：美国总统干嘛要给我爷爷回信？我就对他说了些前因后果。戴晴这次来美国三个大学用英文演讲《黄万里与中国江河》，我要她将讲稿、将我父亲去世时她写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儿子 25 岁那天，把这些英文文章全部刻在一张盘上送给他当生日礼物。

黄肖路的儿子叫“道一”，女儿叫“进一”。她告诉笔者：儿子的名字是黄万里取的。1980 年 2 月底他收到右派改正的通知，十分高兴，3 月 22 日这个孙子出生，他就取名“道一”，取的是孔子“吾之道一以贯之”之意：并不是我错了，我是一直这样的，是你们承认了、改正了错误！

虽然黄肖路后悔没有请父亲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但她对女儿的名字赋予了很多意蕴。“我是与母亲一起给孩子取名的，母女情深，自己有了女儿就特别高兴，我妈叫丁玉隽，我想跟妈的‘丁’姓连起来——就像丁肇中将他发现的粒子取名为‘J 粒子’，J 字就像中文的‘丁’字——给女儿取名 Jenny，我妈说，中文名字就叫音相近的‘进一’吧。繁体的‘進’字中有个‘佳’，我妈名字中的‘隽’也有个‘佳’……”

黄肖路几次提到很想给中国的决策者写信，敦请他们重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迟迟不能翻身的根源之一，就是没有按照自然规律来治水啊。她说，《中国国家地理》执行主编单之蔷的文章很好地阐述了黄万里的治河思想，“要是听了我父亲的意见，中国哪至于有这么多失地、贫困的人口，哪里会有这么多请愿、抗议的事件？”“中华民族这么对待自己的好儿子，不光不发挥他的作用，还要迫害他，这不是自毁吗？最可怕的毁灭中国的力量，不是从外头来的侵略者，而是糟蹋大好河山的自己人啊！”

她特别希望有一个网站，“将我父亲的东西、写我父亲的东西都放上去”。

我问黄肖路，你出生在兰州，当时对黄河有什么印象吗？她说，那时太小，没有印象。对黄河最早的印象是在哪儿也记不清了，好像是在济南吧……

而我，还记得自己对黄河的最早印象：那是1967年“文革”最乱的时候从北京返回武汉，天未破晓，火车在京广铁路上从黄河大桥上驰过。十几岁的孩子，震撼于黄河河道之宽，足有十来公里吧？更震惊于黄河河水的浓稠，浓稠得似乎连一个浪头也翻不动。黄河，究竟我是该嗟叹你的疲惫，还是该赞叹你的坚韧……

我的仲夏夜之梦

白桦

1949年以前，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是一个老式的北京旅馆——花园饭店。之后就成了“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的办公室和宿舍。1953年夏日，我作为一个业余电影剧本作者，携带着自己的一个电影剧本初稿，住进了这个“饭店”。那时国家对电影剧本创作重视得无以复加。真的很幸运，在这个往日的饭店里，一不当心就会和某一位电影大师擦肩而过，如蔡楚生、史东山、章泯、司徒慧敏……等等。那时陈波儿刚刚过世，无缘得见。当然，我接触最多的还是专职编剧们，他们有一些原本就是大上海的电影艺术家，有些人又参加过抗战，去过延安。大多数都是在战争年代活跃在各个战场上的文艺兵，而且都到了而立之年。我在他们中间是个名符其实的晚生。似水流年，青春不驻，今天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那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北京老式“饭店”，还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与我有过过从的前辈们，特别是那些不应该离开、却过早离开我们的人们，恍惚还在“饭店”里走来走去。

首先是所长王震之，王震之大我十四岁，身高一米八以上，性情豪爽，他是一位出生于湖南的汉子，最早的革命和戏剧活动都在北方，所以在他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楚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延安时期，又担任过鲁艺的戏剧教师，在战争年代写过不少活报剧和话剧剧本，在八路军的艺术团体里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他第一次对我的公务召见，是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我原以为他要向我介绍创作所的所规，或者谈谈我的剧本初稿，以及对它的修改方案。在聆听老革命教诲之前，非常兴奋。但是他一开口却让我很意外，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读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吗？当然！——我承认，读过。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安娜·卡列尼娜》来，他对书中的情节如数家珍，记忆力之强，使我非常吃惊。他还说

到《安娜·卡列尼娜》在延安受到知识分子热捧的情景，一本破旧得只能勉强捧着读的中文版《安娜·卡列尼娜》不间断地预约传递。有一位女生用白被单缝成曳地长裙，恍恍惚惚地站在延河边，说是体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情。他说：

“一部看起来和革命毫不相干的小说，会有这么伟大的魅力？！听说列宁反复读过这本书，最后封面都磨破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写得的确好，实在好，非常好。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技巧之高，无与伦比。安娜在卧轨自杀之前，忽然想到她和沃伦斯基初次相逢时那个被火车碾死的人，那情景的再现似乎提醒了她……多好的一个伏笔！”

接着他背诵起书中的句子来了：

“……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照了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托尔斯泰老头像是和安娜同时看到那永远的熄灭……”说到这儿，我打了一个寒噤。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还是把他的话题很技巧地、缓缓地转到电影方面来。

我说：“我不久前才看过嘉宝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

“啊？！”他很惊奇：“你在哪儿看到的？”

“我们总政电影处有一个小片库，蛮丰富，我在那里还看过您写的电影。”

我指的是《内蒙人民的胜利》。

他连忙摆摆手：“宣传片！宣传片！”

我想纠正他：“故事片呀！”

“不！宣传片！那算什么故事。”这一争执，他才跟着我离开了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所长，他很真诚地对我说，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很苦恼。”总想跳出去自己搞自己的创作，

他说：“自己搞创作，成与败，都归于自己，或许碰巧可以写出一部真正的故事片。担任所长，压力太大，电影又特别受重视，连列宁都谈论过电影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一旦某一个题材被领导定为重点剧目，这个剧本就得没完没了地改了，意见都来自高层。比如我们创作所组织的《淮上人家》这个剧本，就是重中之重，名作家孔厥、袁静担任编剧。毛主席亲笔为治理淮河写过八个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我相信淮河或许可以治好，可是把治理淮河的工程写成一部好电影，我这个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就说不好了。我看艺术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传世的艺术品都是无心插下的柳”

这些话让我听来好凉爽。他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十分谦逊的人。经常把“我至今都是外行”这句话挂在嘴上，他在讨论或审查剧本的会上，总是把发表指导意见的机会让给上级领导，如王澜西或陈荒煤。那时一个电影剧本的最后通过权在周扬一人手里。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老革命却胸无城府。有一天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别看所里这么多编剧，整天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进度很慢，有的人来了一年多还没有个提纲，有的人有一个提纲，却永远没法形成剧本。写作是个人的事，又不能像打仗那样，你既当过兵，又写过文艺作品，应该知道，写作不是喊一声冲啊就能把‘碉堡’拿下来。”

不久，如他所愿，他被调回东北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去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也没看到他写出他想写的那部真正故事片。一直到 1957 年夏天，在“反右”运动的高潮阶段，忽然从长春传来王震之卧轨自杀的消息。电影界非常震惊。在极小范围的窃窃私议中，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抱怨他真不该！怎么会想到卧轨呢？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立即想到他和我谈过的一些话，一定是和我一样，“言多必失”。莫非他在绝望的时候，想到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瞥？想到那支“蜡烛”，那支安娜·卡列尼娜“曾经用来照着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把原本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照了个透亮，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剥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我以为，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有充分理由和勇气去死，至于死的方法，那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了。

二

我在舍饭寺 12 号的最好的朋友应该是海默，在我走进电影剧本创作所之前，我们就相识了。1953 年 5 月初，我和他都参加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访问团，任务是去东北第 26 陆军医院、访问被联合国军遣返的志愿军战俘。那个访问团里全都是老作家，如胡风、罗烽等。比起他们来，我显得很小。海默的年龄和我最接近，大我七岁。这个山东籍的北京人，在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了，毕业于华北联大，在冀中军区火线剧团当过演员，写过一些话剧和秧歌剧。我们一见如故，可以说，他是我唯一的一位诤友，他每每见到我，总会给我泼点冷水，从长相到作品。他时不时会突然当面讥讽我：“你以为你的小说、诗歌有什么价值，油墨没干就被人忘记了。现在围着你转的都是中学生，他们盲目。你以为你是快手？我们这里快手多了，我就是快手，想当初，一场战斗刚打响，一幕活报剧就写成了。快，就能决定你的作品是不是艺术吗？”

有时他还会突然盯着我的脸，一本正经地贬我：“你以为你是美男子吗？不是！小眼睛，肿眼泡，身材既不够高，也不挺拔。算了吧，你！”我就是在他的“无情打击”下学会了自省。再如：“你真够浅薄的了，瞧你买的都是些什么书，都是些新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是‘一边倒’的苏联小说，你注意到我买的书没有，全都是旧书、破书、杂书，这些旧书、破书、杂书比那些新书更珍贵，对创作更有用。”我这才注意到他是本所藏书最多的人，一面最宽的墙全都是书架，书架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旧书，地上还堆满民国时期发行的刊物和画报。

他把一本很老的电影画报抽出来扔给我，指着一张女明星的剧照对我说：“你看，上帝留给茶花女的只有一条夜路，可是，当革命一旦代替了上帝，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是谁呀？”

“蓝蘋呀！”

“蓝蘋是谁？”

“年幼无知，蓝蘋是谁你都不知道！还想当作家，附耳过来。”他这才在我耳边说出蓝蘋是谁。“今年你来得不巧，她可能不在国内，不然，你在这个院子里就能碰到她，她是电影艺委会的副主任之一，偶尔会来开开会。”海默在要好的朋友中间，是有名的口无遮拦。对我，他只补充了一句话“小屁孩，知道的事少，也好。”

海默经常出差，为了写剧本“体验生活”，去过朝鲜战场，旁听过板门店谈判。有一次他为了收集地下斗争的故事，去了一趟上海，回来对我说：我到上海拜访了于伶他们，他们才是

真正的地下党员，跟他们一交谈才知道，我写不了，对地下斗争的了解太可怜了！”

那天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所里的编剧全都是来自各个战场的老同志，他们的经历本身就很丰富、很精彩，为什么还要东奔西跑去体验工农兵生活呢？”海默长叹了一口气，说：

“你提的这个问题还确实值得咂摸，说明老弟开始动脑子了！可是，你应该从批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悟到点什么。知识分子上银幕？悬！”接着他又想了想：“其实，你我都算不上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时候都是中学生，算什么知识分子？！这问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那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对他说了一句很唐突的话。我说：“海默！你总这样不着家，小心嫂子跑了！”我真的不是想“报复”他，他却面红耳赤地看了我一眼，没回答我。我能觉察到他对嫂子很在意，也很爱她。海默的妻子是来自老区妇救会的年轻干部，人漂亮、大方，又是很快就能适应城市生活的那种乡下妞儿。组织上很培养，保送到人民大学带职学习，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默默，孩子见人就笑。没想到，我一语成谶，后来嫂子果真和海默分了手。深秋，我的剧本一通过就回了云南。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只是断断续续听到关于各自命运的传闻，海默在六十年代初，有一个最有名的事件，就是牵动过整个文艺界神经的、对电影《洞箫横吹》的批判。他仅仅在剧本中写到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和群众的上访，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即使陈毅元帅在一个会议上公开出面为他辩解，很快也作为右倾观点而被否定。再以后，就是关于海默之死。

1968年6月14日，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恐怖时期的一个日子，因为海默在言论上对江青有过大不敬，那时的江青何等显赫，何等炙手可热，海默因此被乱棍打死。见到海默遗容的人只说了八个字：惨不忍睹、面目全非。十年后，虽然海默一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清查真凶的工作却十分艰难，找不到最先握棒挥向海默的那个暴徒，也找不到最后让海默一棒致命的那个凶手。仅此，就够我们深刻反思一辈子的了！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默默。见到她，我深感光阴的无情，从一个舞动小手的初生婴儿到满面风霜的妇人，只经历了一个噩梦连篇的黑夜。对于她来说，我向他叙述的可能是一个使她感到十分陌生的父亲。

三

在编剧们住的那座主楼里，每逢周末，整个楼的人几乎都探亲访友去了。晚饭后很安静，到了六点，楼道里总会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叫的是一个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叫井岩盾。她的声音响亮、尖细，而且有些犹疑。每一次都要叫到十几声以后才消失，之后寂然，无处可去的我就开始伏案写作了。夏初，海默从朝鲜板门店回来，我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周末那女声的来源。他一听就明白了，随即作答：“那一定是关露，你知道关露吗？”

我当然知道关露，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在1943年的日本画报上看到过她的照片，那是她出席日本“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拍的，就是那张照片，使她成为妇孺皆知的汉奸，不断遭到举国民众的唾骂。1949年以后才听说她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人员，一个受命深入虎穴的红色间谍。但为此，她的青春、爱情、名声已经被完全撕碎、污损。但是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当下为什么不赶快公开宣传她的事迹，让这位在隐蔽战线上的抗敌女英雄，在更大范围里恢复名誉？为什么让她至今都身负骂名呢？

今天，这个神秘的人物居然是我的邻居。我问海默：“我可不可以跟她谈谈”。

海默回答说：“再好也没有了！在这座楼上，不少人躲着她，一到周末她所以呼叫井岩盾的名字，因为她太寂寞，无人诉说。”“井岩盾是她的爱人吧！”

“不！井岩盾也是一位曾在延安鲁艺学习过的作家，我们所的一位编剧。他只有三十来岁，比关露小十几岁哩！可能井岩盾和她谈得来，或者只有他不好意思拒绝关露。”

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里，我在走道里和关露擦肩而过，她把钥匙插进锁孔，没有立即开门，站在门前看着我。我也没有推自己的门，几秒钟的对视，光线很弱，我看不清她的面目。她先叫了我一声：“小白桦！”当时文学界的确有人这么叫，因为文学界本来就有两位年长的“白桦”。

我走过去。她指着我说：“我知道你，来自云南边疆，是海默告诉我的。你真的是很年轻！”

“不！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她苦笑，叹了一口气，夸张地重复着我的话：“已经二十三岁了！”我猜想她一定是想到了她的二十三岁。

“愿意进来坐坐吗？不耽搁你写作？”

“一会儿，可以的？不打搅您吧？关露同志。”

“非常欢迎！请。”我走进去，她让我坐在靠椅上，她自己坐在床沿上，那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很简朴。我以为，她已经忘掉、或是特意把过去的“伪装”抹去。很自然，我一开始就在她的容貌上寻找浪漫诗人关露，红色间谍关露，但我都失败了。四十多岁的她，比起当时她的同龄人来，显得更苍老一些。她已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妪了，走在街上谁也想不到她曾经那样有才情，写过许多阳光明媚的诗歌。也想不到它曾经穿着最可体的旗袍，信步走在上海霞飞路上，手钏和耳环闪闪发光。她那双时髦皮鞋的高跟经常在出入极司菲尔路 76 号——那是一个最恐怖的“狼窝”——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此刻，我看得出，她在全力支撑着的自信，掩饰着身不由己的神经质。那时，我还很孩子气，总想试图去探索她最敏感、最神秘的过去。

“关露同志！应该说，您又回到电影界来了。”

“不！我过去也没有做过电影。人们一见到我就想起《十字街头》里的那首歌词‘春天里来百花香’，那是偶一为之的玩儿票。我没有写过电影剧本。”

“现在可以写呀，您的经历这么丰富和神奇。可以写一部很精彩的电影。”

她脸上的肌肉连连抽动了几下，像笑，又像哭：

“年轻同志！你知道党的纪律吗？铁的纪律里有一条是保密，面对党的机密，我没有自己，我的爱，我的恨，我的青春，我失去的和我得到的，我的诗，我的梦，包括我想告诉你和你想听的故事，都在一个警卫森严的保密室里，那里有许多带锁的抽屉，其中有一个抽屉躺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档案袋上，右上角写着绝密两个字，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关露，我在那只袋袋里，至于什么时候打开那个袋袋，让我回到我自己的躯壳里来，我也无法知道……”

看来，从她那里听到我最想听到的神秘故事是不可能了，因为她压根就不会讲出来，这是党性。是不是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了呢？她不说话了，整个房间像死一样寂静，整个楼层像死一样寂静。

“可我又不能没人交谈，我能谈什么呢？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家，我的儿女，没有，

没有。但我不甘寂寞，我希望有人经常向我随便讲点什么，家庭生活呀！社会新闻呀！人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怄气，为什么笑，为什么哭？”

“……您没有痛苦和快乐吗？”

她茫然地看看窗外：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不在这里，关露没有回来，这里没有关露……”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交谈只是想听别人说话，严格地说，他想听的是别人的故事和生活。

“啊！是这样，您的老朋友一定很多。”

“是的，有些……”她小声吐了四个字以后她就不再说什么了。

又停顿了很久，她用气音央求我：“说说你自己，怎么参军，怎么走过火线。对，你来自云南边防部队，那里有的是奇风异俗，浪漫故事，有很多可讲的呀！”

“是的，有很多讲不完的话题。”

她要的只是听。我勉为其难地开始讲自己的经历，虽然她和我的互动很积极，但一对一地方式，我很不习惯。很快我就陷入一种难以脱身的、乏味的困境。这时我才完全明白，为什么每个周末她会在走道里呼叫井岩盾，井岩盾为什么大部分周末的傍晚不在房间里。突然停电使我有了一个告辞的理由，但她很迅速地点亮了蜡烛，而且告诉我：

“这样不是更好吗，就是不停电，我也常常独自面对烛光。”

我只好又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她可能已经看到了我的倦容：“好了！谢谢你！真委屈你，周末，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一起热闹。”

我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好她握别，言不由衷地说：“很高兴！关露同志！”

出了她的房间，我隐隐地有些担心，担心以后每逢周末，她在楼道里喊叫的不是井岩盾、而是我的名字。但我所担心的事并未发生，电影剧本创作所为了我的剧本早日投产，安排我去了北戴河的夏日别墅，这一去我就再也没见到关露了。后来，听到关于关露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可怕：1955年在潘汉年一案中受牵连，入狱两年。1967年，年过花甲的关露再次被捕，又是8年铁窗生涯。1982年3月，听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她宣布了平反的决定。我真心为她高兴：这一次应该是真的回来了。可是，还没到年底，就听到她吞服大量安眠药，溘然长逝的噩耗。为此，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在平反以后，在洗尽污秽、正好大放光彩的时候，又匆匆离去了呢？！

我没有问……

2012、7、20

一个老右的“宪法梦”

黄宝松

中共十八大完成了第四代到第五代的权力交接，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记伊始，就发出“中国梦”、“宪法梦”的最强音，强调两个百年（建党一百周年，建国一百周年）要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的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提振了国人的精气神，上有所倡、下有所从，于是大家都纷纷进入梦境，连外国人也受到感染，坦桑尼亚总统基培克不是也说起了“中国梦”么？

梦、说直白点就是一种理想、愿景与追求，就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所做的梦各不相同，像“万花筒”一样变化万千形形色色。农民工的梦不同于既得利益者的梦；莘莘学子的梦不同于垂垂老人的梦；卖火柴的小女儿不会和白马王子的梦相同；自然《红楼梦》里贾府的焦大也不会和林妹妹做着相同的梦。随着时移事异，即便同一个人所做的梦也会发生变异。就拿鄙人来说，历经“中华民国”，毛的严酷统治，邓小平改革开放至于今日，称得上六朝元老了，早年因家境贫寒，读书求学，做的是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扬名显亲、光宗耀祖的梦；被“解放”后由于马列主义的灌输，党化文艺的洗脑宣传，向苏联学习，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那段不知影响了多少年青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与精力都贡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作的斗争！”做的则是要解放全人类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梦；57年大魔头玩的那场阳谋，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大一学生，亦被划成右派打入另册，原先的美梦就变成连绵不断的恶梦。特别是在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率兽食人的那三年，因“恶攻”“三面红旗”而升级为“新生反革命分子”，被关在成都宁夏街的“鸡圈”里，每月号称18斤囚粮，每日两餐，早干晚稀，层层克扣下来，落实到肚的顶多半斤，年青力壮的我，饿得来形销骨立，肚囊皮贴上了背脊骨，能做的就是“那天能吃饱一顿死了都值”的梦。

尽管梦各有别，无论伟人和草根，追求生活，追求应该如此的生活，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却是相通的，这就是习总书记的“中国梦”、“宪法梦”。无奈“南周事件”，“南方周末”元旦献辞的《中国梦，宪政梦》遭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不学无术的新闻刽子手庹震撤换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只字不提“宪法梦”之后，“两梦”差不多就跛了一梦，出现于各种传媒的只剩下“中国梦”了。显然这是“中宣部”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公然阉割，是胆大妄为地与最高领导唱“对台戏”，此种恶行令人愤慨！要知道“中国梦”、“宪法梦”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缺一不可的。“中国梦”、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在“宪法梦”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宪法梦”、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又保护着“中国梦”梦想成真！换言之，“中国梦”是“宪法梦”的目标，“宪法梦”是“中国梦”的保障。只让做“中国梦”，不准做“宪法梦”，就像两条腿走路偏用一支脚跳行那样既愚蠢又不合适宜。

习近平在就任总书记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是对“中

国梦”、“宪法梦”辩证关系的深刻诠释，也是对“宪法梦”丰富内涵的精辟注脚。李克强总理最近誓言：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是对习总“两梦”的有力呼应。中国党政首脑双剑合璧，在“宪法梦”上心有灵犀，可见本届领导把实施宪法、落实宪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视为头等大事。只有厉行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兑现民主宪政，国家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如期建成小康社会，才能有民族的富足与强盛！“宪法梦”说穿了就是“宪政梦”。

老朽年届八旬，风烛残年，来日不多，美梦、恶梦做过不少，都似一江春水付之东流了。纵是壮心不已，聊发少年癫狂，贱命也不会再有出彩的机会。倒是这“宪法梦”挥之不去，要死而后已一直做下去的。因为 57 年我被整成右派的罪状之一，就是恶毒攻击“肃反”运动违背宪法，侵犯了公民的言论通讯自由（以我所在单位为例，大会动员之后，即分男女编组集中居住，每组又分为几个四五人不等的生活小组，吃饭睡觉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得三人以上同行，私拆信件，收缴日记，被视为“肃反”需要的革命行为），和当年所有助党整风的良友诤言一样，是切中时弊的苦口良药。殊不知毛魔头存的是机心，玩的是权术，是在为整肃知识分子、扫清其南面称“孤”的“拦路虎”制造借口。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过是“钓鱼”、“引蛇出洞”投下的诱饵，把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打压成不敢吱声的驯服的奴隶，乃是其城府于心的真实目的。1954 年制定的宪法，在大魔头看来不过是：外国有我们也得要有。用来装点门面，做做摆设，拿给外人看看，并不准备实行的。正是由于不遵宪、行宪，维护宪法的威权，毛魔头临驾于党国之上的个人专制独裁才得以确立。自兹以降，偌大的中国祸乱频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种随心所欲的梦呓，不仅未能超英赶美，跑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相反走向的却是森林滥伐，资源破坏，生态失衡，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反右使 55 万多知识分子罹难；反右倾又让两百万干部遭殃；三年人祸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十年动乱致使两千万人死于非命，经济损失一万三千多亿，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凡此种种都是不遵宪、行宪、造成的恶果。当初如能恪守宪法，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须经最高全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批准，公民有言论自由，有监督政府的权利，那些祸国殃民的运动大概不会发生，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至于手拿宪法保不住自己的性命，早几十年我国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镜鉴可明兴衰，以人镜鉴可知得失，以铜镜鉴可正衣冠。所以这“宪法梦”是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之本，强国之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的权力，只要每一个人都承担起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和义务，何愁国家不兴旺繁荣、人民不过上幸福尊严的生活？所以遵宪、行宪、维宪是全民的共识。然而、宪法的权威在于实行，但其条款众多，全面落实非朝夕之功。当务之急，首推落实宪法第 3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这至关重要的一条，行宪“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就从贯彻本条开始罢。

如果认真执行了这一条，撤换《南方周末》“元旦献辞”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台湾艺人伊能静就不会因为发微博支持而被请喝茶乃至取消在大陆的工作；肇事舆论杀手庹震就该受到撤

查。

落实这一条，群众在公共场所扯起横幅、要官员公布财产的诉求就不会遭“国保”禁止；“彭水诗案”那种现代文字狱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地方恶吏也不敢派警察到北京来抓记者。

遵守这一条，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就不该受到监控、逃脱至京最后远走美国；刘晓波也不该因“零八宪章”被当局以“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11年，至今关在监狱。

贯彻这一条，几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右派老人们要求给右派平反而不是改正、要求补发二十二年的工资、要求赔礼道歉、要求重新评毛、肃清他的流毒的言行，就不该受到打压封杀；“天安门母亲”一再上书希望平反“六四”、给遇难者以赔偿的要求，就该得到回应。

恪守这一条，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杨继绳《墓碑》，张戎·哈立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优秀历史著作，就能公开出版发行，就不会列为禁书，像目前这样只能经香港印刷，“出口转内销”。诚如是，历史的真相就会揭开，“尸出堂、像下牆”就指日可待了！

这一条得到保障，网帖、微博、“敏感词”就不会横遭删除，亿万群众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表哥”、“表姐”、“房媳”、“房叔”无处遁形；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将進一步发挥，更多的贪腐分子会被挖掘出来，社会的丑恶现象会及时曝光，收到肃贪反腐，弘扬正气，澄清玉宇之功效。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只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将功莫大焉！一路通，路路通，其它条款的实施也会迎刃而解。“宪法梦”就是“宪政梦”，中国的宪政之路，漫漫而修远，但它是通往普世价值之路，是复兴中华、真正富国强民之路，老朽虽人命危浅，来日无多，那怕走不到路的尽头，但“梦”会一直做下去的！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个行将就木的右派老人，一生追求宪政民主，如今是甚么也敢讲，甚么也不怕的了！

地下党员被摧残的一生

裴毅然

——四九年前出生入死为中共，四九年后，划右派劳改，文革定叛徒，越狱逃跑，八年乞讨求生。毛死平反，已浑身是病。回忆录留下一句话：毛循马列哲学摧残了我的一生。——

赵宏才（1923—2003），河南洛阳人（本名赵洛生），中共南京地下党学生党员。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一直担任中央大学地下党秘密组织“新青社”领导骨干。1947年6月，南京学运高潮中加入中共，次年任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1948年南京易手前两次被捕，险些丢命，冒死越狱逃脱。可这位革命者真正的苦难是“解放后”，五七年“划右派”，二十一年非正常生活，文革再陷囹圄，两次越狱，挣扎于死亡线，八年乞讨打工，直至毛去世才回家。此时，他鬓毛摧枯，浑身是病：萎缩性胃炎、肺气肿、关节炎，最后是心脏病，肺癌，心脏搭桥，但他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劫后余声》。

五七年为了党忍痛接受划右

1948年底，南京地下党派赵宏才前往江北赤区，专跑与红区的交通，负责将地下党员及左翼人士送往“解放区”。多次遇险，被吊打、压杠、假枪毙，手下交通员被处决。一夜吊打，悬绳三断，冒死脱逃，冬泅冰河，回来后却遭一年审查，经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后任上海市长）批准，恢复党籍。可这段被捕经历，只是他一生苦难的开始。

1957年，赵宏才供职中苏友协，整风办公室负责人。机关二把手林朗命他写墙报文章，将毛泽东动员鸣放的话用他的名义写出，以动员大家积极鸣放。赵宏才写了三篇〈闲话〉，“提倡说心里话”……便成为单位“右派”头目——都是你鼓动“右派”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尽管三篇《闲话》全是毛的三次讲话，林朗的解释是：毛主席讲，是左派立场，你讲，是右派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划成右派后，只有一条路：真诚认罪。赵宏才以“真正党员”自居，为维护“党的威信”，忍痛糟蹋自己人格，承担反党罪责。划右结论，经层层拔高后才获上峰批准。

中苏友协一把手是1926年入党的印度尼西亚归侨廖经天，抗战爆发后赴延安，与林朗乃多年老战友。反右开始，上级指示林朗揪出廖经天，林朗实在下不了手，“舍车保帅”推出赵宏才。廖经天不明就里，党组会上为赵宏才辩护，说赵是十分忠诚的党员。最后，不仅廖划了右，林朗也划了右，罪名“包庇大右派”！反右正酣，林朗发现患癌，他忍痛接受批判、检举他人。不久，林朗去世。

第一、二把手先后倒下，三把手李某扶正，他做赵宏才的工作：“你不要不服，要一切从党的影响来考虑。”赵宏才晚年说，这位领导诱导他“心服”的话，他记了一辈子，每个字都像火红冒烟的烙铁哧啦啦烫着他的心。为了“党的影响”，再冤枉也得服。廖经天不服，一九六二年后多次从流放地贵州铜梁返京闹翻案，一再碰钉子。

和北京文化部右派一起劳改

赵妻年纪比丈夫小，党龄却比他长。为免株连妻儿，赵宏才提出离婚，赵妻不耐烦了：“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性格倔强的她，平日三天两头跟男人吵架，此时特别温柔，不再跟他吵了。她在学校工作，因她不肯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行，有人侮辱她与“老虎”睡觉。他们被赶出机关宿舍，搬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破旧小平房，大冷天睡在阴冷潮湿的地上。严冬季节，赵宏才发配渤海滩唐山柏各庄农场，中宣部系统的下放右派有廖经天、萧干、陈企霞、钟惦棐、蓝翎，《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新四军出身的记者季音，还有一位部长（抗战前泰共华侨）。这些人心甘情愿被骂“丧家之犬，没人性的野狗”。

他们的共同疑惑是：“同样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同样用胁迫劝诱的手段，同样要你低头认罪，为什么国民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败了，共产党却办到了？”一位南京某大学郭姓右派，批斗大会上低头认罪，私下与组织谈话坚不认罪，许多右派都摘了帽，分配了工作，他仍戴着右帽在拉板车。有位党员同情他，要他认个罪算了，郭右派凛然回答：“气节！”而之所以当众认罪，那是“维护党的影响”！

一位农村工匠与赵宏才告别时说：“大兄弟，你是个大好人啊，遭了这么大的难。共产党

实在太古怪。”赵立即堵住他：“不，大哥，是我罪有应得，不能怪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说，乃是赵不希望对方认为自己对党有看法。直到晚年，他才意识到这是真正的愚昧。

赵宏才与钟惦棐邻床，关系极熟，两人躺在床上谈起钟那篇《电影的锣鼓》，钟嘿嘿一笑：“那是周扬和我交换意见以后，他叫我执笔写成文章发表的。”啊，原来如此！次日，农场领导问赵：“钟惦棐跟你讲了周扬部长什么了？”赵宏才极其惊讶，只好如实相告。领导听后说：“这就对了。昨天钟惦棐急着找我，赶在你前面说了此事，怕你歪曲他的话，添油加醋，咬他一口。”那么亲密的老钟，竟如此防范自己。赵宏才看到别人借揭批萧干为摘右帽挣分，他也蠢蠢欲动，但无材料没做。

文革打成叛徒、逃跑乞讨为生

1959年河北省委正式下文，为赵宏才摘帽，回原单位听候分配，他的反应是：“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他被分配至徽州专区农校，任副校长。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俞时模，右派摘帽后，也发配歙县师校任副校长。这位老干部，文革时押入黑牢，活活整死。

文革初期，徽州派系斗争，赵宏才四处逃躲，有家归不得。徽州农校成立革委会，他以为局面安定了，回到学校，不料两派头面人物“大联合”搞阶级斗争，专斗黑五类。他被关入楼梯下面的小黑房，仅一个便盆供泄溺，老鼠日夜猖獗，每晚审讯，踢打逼供。俞时模此时也关在农场黑牢，惨遭刑讯批斗。俞曾越狱，可惜失败，死于非命。死前，耳朵已被耗子咬烂。赵宏才不甘如此就死，再演昔日越狱故事，逃出囚禁，有家不敢回，流浪皖北巢湖一带乞讨，夜宿废弃的瓦窑场。

一位地主成分的农村小学教师，受不了批斗自杀。造反派念着毛语录将尸体抬上台，两个戴口罩的造反派将死尸竖立台前，一批人挥着小红书进行“尸斗”，台下一片寂声。赵宏才看得连忙转身离去。

乞讨中，他得了伤寒，差点死在“旅途”。后见报纸上说“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他回到学校。这次不再打骂关押，但经地委批准，大会宣布他是叛徒，交原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他每月向地区革委会递交申诉，要求平反。不久，上面来了两位项目人员，说是定他叛徒没错，但可以不作为叛徒，宽大处理，解除劳改。赵宏才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于是继续当叛徒、继续劳改。

劫后余声：留下一部回忆录

多年劳改，这位革命青年逐渐衰老，头发花白，百病缠身，正不知所以，“忽传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止。”新任地委书记正是1949年审查他越狱者，递呈一纸申诉，问题迎刃而解，解除劳改，恢复自由。同时，中宣部也来函，要他申请复审其右派问题，右派问题也获改正，“俱往矣”。

复得自由，赴宁见妻，夫妻相拥，泪流千行。回忆录至此戛然而止，2000年12月7日，这位真诚的革命者因肺癌走完人生，留下一本用生命最后六年完成的《劫后余声》。他说最后心里长出一个“肿瘤”——

惦着“指出马恩一些根本性哲学观点之错误，指出毛遵循马恩哲学摧残了我的一生，也摧

残了无数无辜。”

密友穆广仁评价《劫后余声》：

那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流着鲜血的心发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屡遭劫难的生命的悲歌，是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体制的血泪控诉，是对甘作或被迫当“驯服工具”的弱者的心灵剖析。

赵宏才回忆录超越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控诉层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异化，努力挖掘赤灾成因，能溯源至马恩，相当不易。

延安一代“两头真”的悲剧

受时代与文化的制约，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许多“两头真”真正的悲剧，是最后还在坚持赤说，还以“真正马列信徒”自居，还认为“经是好经，只是和尚念歪了”，他们已不可能认识到一生悲剧的最大肇因正是这则共产赤说。正是那个似乎绝对神圣的革命目标，才将中国一步步拽离理性之轨，从争取民主自由到为毛独裁专权而狂热欢呼。

至于他们个人的命运，当然只能“共沉浮”。很简单，若无这面“走向天堂”的旗帜，一切左灾如何起步？如何发动？“伟光正”的党又怎么会集体认同毛公然违反一系列基本人文原则的反右与文革？

从一个电视剧演员想到的一件往事

木人

最近日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刚上演的一部电视剧。在演员名单中，我把饰演主角母亲的老演员吕中，糊里糊涂地误以为是吕恩。这一误认倒使我想起了吕恩。我并不认识吕恩，但不由得想起五十多年前，曾经办过的，多少涉及吕恩的一点往事。

2012年8月16日《北京晚报》曾经刊登了一条消息——“8月15日，北京人艺著名演员吕恩以91岁高龄去世”。次日报道：“……吕恩原与吴祖光为夫妻，吴和新凤霞结婚后，吕和影星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国民党起义空军）结婚，胡于1968年去世”。

1955年，我从政务院（今国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当时让我在干部科工作，干部科就是人事工作。一般来说这工作本来是应该党员老干部作的，我当时是团员，学有自己的专业，不愿意干。司长说只干一年就调整。只好勉强干着。

1955年，中南空军要把一批“不适合”在军队工作的人员调出，让我们派人去接收一批。我被派独自去武汉办理此事。

到了武汉，住在中南空军招待所，整天看档案。其中就有吕恩丈夫胡业祥的档案。他作为国民党起义人员被确定调出军队。

胡是在抗日战争爆发，正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读书，适逢日寇入侵，国土沦丧，国难当头，怀着一腔青年爱国热情，从大学二年级毅然“投笔从戎”，而后于1942年被送美国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飞机的。1944年回来，参加了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和日寇飞机作过战。可以说真正参加过对日寇的战争。

后来，在 1947 年，观察到国民党腐败误国的情况，没有跟随国民党逃遁台湾，1949 年，和吕恩到了香港找到夏衍。当时，夏是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他们毅然要求投奔解放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按照夏衍的意思从香港回到上海。

不料回到上海，胡业祥又被国民党以“匪奸”罪逮捕押解台湾。在台湾经过亲戚用贿赂手段救出，再次回到上海。接着，上海解放，又参加了起义。

建国的五十年代初，人民空军刚刚建立，急缺战斗机驾驶员，胡还参加了 1950 年国庆飞机编队飞掠天安门的检阅飞行。后来怎么到了中南空军就不知道了。

1955 年开始的“肃反”运动，胡就被怀疑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要清除出军队。

当时，胡业祥和吕恩已经结婚，属于两地分居。中南空军另一个意见是调胡到河北良乡空军担任驾驶教官。二机部要了这批人，只能分配中专和技工学校搞生产技术的教学工作。中专培养的是制造人才，对驾驶人员来说，又是外行。再说这些学校大都是在西南、西北，胡如调去，仍然和吕恩是两地分居。既然作人的工作，就得要对人负责。衡量之后，我认为胡业祥到良乡工作，教驾驶飞机熟悉，回北京也方便，还可以解决和吕恩的两地分居问题。吕恩是比较有名的演员，被誉为话剧《雷雨》的第一代“繁漪”。五十年代，在北京刚刚演过一个关于纺织女工的话剧。不可能把她调往别处。最后我决定不接受这批人员。支持分配他到良乡军校教驾驶。

时过境迁，两年后我成了“右派”分子，也成了挨整的对象。事后当然也就知道这一对夫妇的事了。

从网上一搜索，虽然信息极少，估计这一对夫妻的一生也吃了不少苦头。

吕恩是一位比较知名的演员。在“旧社会”演过不少进步影剧，和戏剧界左翼知名人士有较深交往。解放后，也参加了不少影剧的演出。她去世后，有的报纸的报道称她为：一级演员，优秀党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她还是北京文联理事。她的丈夫胡业祥五十年代，虽然作了“飞行教官”，想必为了“国民党空军”的历史问题又继续挨整，后来还到体委工作过。从网上看到的片段信息是：“文革中又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被隔离审查，经常挨打，没有收入，通过私人介绍搞一点英文翻译，每月收入 68.50 元人民币，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平反。68 年去世。”按其经历推算，去世时还不到 60 岁。再联系到“经常挨打”，说不定是文革被打死的。如果是被打死，那就不能明说，明白不明白，反正说吕恩她丈夫 68 年早就死了。

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位未具名者写的文章——《回忆胡耀邦》——新事与往事。文中谈到：1980 年 7 月下旬，作者写了一份《一批原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情况》为三十万挨整的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鸣冤。后来被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胡耀邦的询问，而后，胡耀邦责成统战部秘书长彭友今去查办。办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吕恩的讣告不免有些蹊跷。

第一，是吕恩去世的讣告，为什么非要加上她的丈夫是胡业祥，还说胡是 68 年去世。又不是胡的讣告。而且还把胡蝶也挂上是什么意思？

第二，胡业祥 22 岁大学二年级从戎，到 68 年，大概不到 60 岁，有文章说他“经常挨打”是不是文革被打死的？

第三，一个 22 岁的学生为抗日“从戎”，1938 年到哪儿找共产党去？那时候这些审查者在哪儿？你们在干着什么？根据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 2013 年 4 月 4 日发表在《凤凰网》上的文章说：“1938 年，抗日刚开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怎么 1938 年毛泽东还称

蒋介石是“伟大领袖”？这又该算什么问题？

第四，对原为“国民党工作人员”者，究竟是什么政策？

而后，吕恩退休，已经成了 71 岁的“家庭老太”了，被批准为党员，不免觉得好笑。

共产党建政后，由于人事工作者的无知和左倾，在历次运动中，不能历史地看待历史问题，不知道冤枉和害了多少无辜的好人。哪个人档案袋里究竟有多少害人的“不实”材料，谁又能知道？

4月8日，在《凤凰网》看到了一位周蓬安先生的 BLOG 上的《陕西省授予“国民党”士兵“烈士”称号》的文章，更是叫人感叹历史的吊诡和百姓的无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现在摘抄一段如下：

陕西省政府近日批准抗战牺牲的原国民党士兵徐治邦、郝兴泗、任丙杨、吴宗树、江家强为烈士。徐等五名同志系原国民党陆军第四集团军 96 军 177 师 530 旅 1059 团 3 营一等兵。1939 年 1 月 23 日在山西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中条山对日作战中牺牲(报道见 4 月 10 日央视)。

博主评论说：纪念抗击日寇而牺牲的先烈，善待那些曾英勇杀敌的幸存者，本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措施，可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党派之争和意识形态宣传，甚至一度“贪天功为已有”，试图抹杀原国民党士兵在抗日战场的存在，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陆续从撕开的一扇“小门”中了解到国民党官兵在抗日战场上那一幅可歌可泣的故事。

据国内历史学家统计：八年间，国民党军队发动大型会战 22 次；小型战斗 28931 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 3211419 人。空军阵亡 4321 人；毁机 2468 架。海军船舰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近 200 余名。1985 年中共首次和公开承认的就有 85 位为史学界倡扬者。1986 年已经达到 115 位。仅在抗战的头四个月里，黄埔军校 25000 名青年军官，战死疆场者就有 10000 名。

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人，作为抗战胜利的直接受益者，我们实在是愧对他们。

抗战胜利 60 周年，中国政府颁发了 60 万枚抗战胜利纪念章，可极为遗憾的是，对抗战影响极大的台儿庄战役幸存者，竟然无一人获得。曾在该战役担当敢死队队长，后升为国民党少将的仵德厚因其与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表现，曾被国民党三次授予勋章。老人也未能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后在极度失望中死去。

中国在缅甸的远征军新编 38 师 113 团上校团长刘放吾。撒切尔曾握着他的手说：“我听说过你的英勇故事，感谢你救了 7000 多英国人的性命。”布什也曾致函给刘说：“我愿意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了 500 多名各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勇敢行为。”马英九也表彰他参加了 128 淞沪会战、813 上海会战及缅甸仁安羌力战日军，为盟军解围的功绩。

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大陆却鲜有人知。中国在境外的第一个抗日纪念碑——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还是由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一手操办的。

【注】次日，香港《大公报》报导：陕西省政府关于发给国民党抗日士兵奖章，批复文件称五人为“同志”，引发网友热议。昨天（4月11日）陕西省政府官方微博响应，该政策一直在执行。据记者查询，针对国民党军队抗日致残官兵可否按残废军人给予抚恤待遇问题，民政部曾表态：查实后可批准。但对外不作宣传。

我的这篇小文写完发给老友吴越，他加了如下的按语后，发在他的 BLOG 上：

吴越按：我表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投笔从戎”，当了飞行员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战争期间，他奉命轰炸解放区，他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回来告诉我们说：他把飞机上的

照相设备破坏，然后把炸弹扔到没人的地方，就回来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奉命去台湾，他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父母年老，想不去，还说：“我会开飞机，共产党会用我的。”后来大概是不许他退伍，不得已只好去了。解放后，他父母因此受了很多苦。后来他成了台湾的空军副司令，退休后回老家探亲，受到了当地“热烈欢迎”，还说什么“爱国不分先后”之类。

胡业祥如果1949年去了台湾，结果会是怎么样？

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与苏军的“解放”纪念碑

龙应台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著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

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鎗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

2010 年中俄两国官员向长春“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长春围城

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

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

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

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槛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人。

(六)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共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十万个共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

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尸横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噎有弃尸。眼楮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噎着不会哭了。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著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曲的，造酒用的曲，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曲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你把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他说，那还用说吗？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说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不让饥民出城，噎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

“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艾思奇和云南的两个李曰垓

——致老同学电邮信摘录

汉生

同学们：近好！

随电邮发来近期的《巴山夜雨》20期与《网摘》15、16期请选看。

《巴》刊第20期有一篇谈艾思奇的文稿（即《艾思奇是内控右派》），我这里说几句。对于艾思奇，我知道的不多，他的著作也看得很少很少，因我一贯不喜欢哲学一类的东西，但却是很尊敬这位先知、哲人的。若没有记错的话，学生时代，解放前，班上的纯修学兄就是与几位比我进步多了的同学（那时是悄悄地）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受到鼓励、影响，向往进步，以致后来参加革命的。如兰、报晖想必一定也拜读过的。而我当右派后结识好些地下党员（也是右派），也在青年时代读过艾先生的书，向往革命的。去年11月，我到云南腾冲旅游时，就是以虔诚尊敬的心情，到腾冲县的和顺古镇艾思奇故居（现辟为“艾思奇纪念馆”）参观访问的。艾氏故居，简朴清雅，进入纪念馆大门，是一个小花园，竖立着艾思奇的雕像，

继而才是故居的老屋，一楼一底的半西式围墙小院，故居里展示了艾思奇许多传世、经典著作和艾家家人的许多历史照片，游人参观后，是会受到感动和教育的。去前，我已知道艾在五七右祸中含冤负屈“被”暗划为“中右”（“内控右派”）……，过早地去世了。可是，一进故居大门，迎面却有一幅不小的题板式的题字——“学者，战士，真诚的人”，题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位翻脸不认人，“万”不了“岁”拼死想活也活不过八十三的 Mao 某人所写，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参观完出门时，见那块题板后面小桌上有参观的题字本，此时，我不禁拿起笔来，一气写下了以下的“题字”：

“一代哲人，真正的伟人，三、四十年代激励着众多向往民主、自由的青年群众，参加倒毁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如此受人崇拜的智者，贤者，却在晚年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郁郁忧虑而逝去。这段真实历史，应公诸于世，谴责制造冤屈的罪魁祸首。 八十老人 来自四川 2012.11.14.”

当我写了刚离去，看见一个青年接着在那里看，至于他看不看得懂，我就不管了。事后我想，我写得也不够清楚，词语也不达意，写了又有何用？回来后，有朋友说，你为啥不写明就是毛某人搞的，有种就留下真名。事情就是这样，汉生乃性情中人，冲动，包不住，老不歇火。对与否，现在写出来，请各位评说。

附上参观腾冲和顺艾思奇故居的一些照片，供分享。值得一提是，最后一张是艾思奇（本姓李）父亲李曰垓的照片。

李曰垓（1881-1944）：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元老，出任云南护国军秘书长，著名讨伐袁世凯称帝的《讨袁檄文》就出自他的笔端，被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为“天南第一笔”，后任滇西第一殖边督办，政绩斐然，并有诗文传世。

另一巧事，云南昭通还有一位与艾思奇父亲同姓同名的**李曰垓（1941-2010）**，当然前者是后者的老前辈，此君的驰名，是在 1957 年“右祸”中，刚满十六岁就被打成右派，是中国年岁最小的右派，是一位才子，虽被非法判刑劳改长达 21 载，却在狱中自学成才，学完大学文史哲全部课程，写得一首好字，学会赋吟诗词，更写出了许多优秀犀利的文章，曾任云南昭通地区财贸学校教师、副校长。如此英才，不到七十岁就早逝了。一龙学兄，对此君想是知道一些的。

老天为何对两位**李曰垓**如此不公，奈何！非天意也，人祸也。

汉生一时兴起，唠叨如此。

2013.04.09

（下面是几位老同学的反馈回言）

汉生：

留言好。但老人可别太激动，应吸取如兰（——一位正直的老同学，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得了脑血栓，因此不起，早走了--汉生注）教训！对艾老我特尊敬，记得在 48 年秋，我偶然在（成都）东玉龙街一家旧书店看到他的《大众哲学》，而封面却是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启

蒙啊！

报晖

汉生老同学：

你介绍曾去云南腾冲和顺参观了艾思奇的纪念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解放后才读过，当时觉得通俗，易懂，逻辑性强，是唯物辩证法的普及读物，但能唤起青年人对革命，对真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当时对我们参加革命起到了启蒙推动作用。但后他来默默无闻不知去向，原来是被那位王者打倒下去了。还有大家知道老毛的秘书田家英，四川人，也是精通马列写得一手好文章，最后逼得自杀而终。真是只有一言堂，独霸专制。这些今后一定要清算平反。《巴山夜雨》中张泽石谈他的一生经历也很曲折坎坷，经历了天上地下的环境，感受五味杂存。但他始终怀着中国知识份子的一颗忧国忧民，坚持真理，真挚的心。忍辱负重的坚持下去。对党和国家的未来仍抱着良好的期盼。值得赞许。 江渔